

新视界

NEW VISION

学人访谈

朝鲜问题与半岛局势变化 P01

学术论文

共同利益中的冲突偏好：贸易摩擦中的中美非合作
博弈 P07

国关人物

安德鲁·莫劳夫奇克 P26

他山之石

模拟外交决策过程与本科生教学 P29

2013 届毕业生特辑

..... P57



南开大学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国际关系系

编者的话

“毕业特辑”做到第三年，这一季《新视界》于我，是一梦六年已倒数计时的南开岁月，是“南以离开”却终须一别的离愁别绪，似也昭示着“告别”二字的分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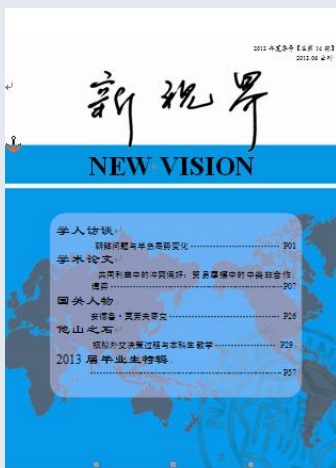
告别是恰如一代国关大师沃尔兹辞世般猝然。它带来沉痛的悼念，却也赋予我们反思与激励。时至今日，纵使没有亲历大师的课堂、没有亲闻大师的教诲，多数国关学子仍能通过课堂内外的学习、透过字里行间的著述，感知其思想之深邃、理论之简洁、论证之有力，这已是国际关系这一学科勃兴发展的明证。而大师所留下的珍贵思想遗产，也必将激励着后人在未来的教学、科研道路上探索前行——这无疑已是最好的纪念。

告别也是“为延续回忆永恒的华丽”的隽永。终于要从《新视界》的老编辑退居普通忠实读者的我，恰如今日比肩而立、他日聚散天涯的国关系各位同窗挚友，或许再不会为第二日站上讲合作课堂展示时的自信一笑而挑灯夜战，或许再无法轻松对几大国关理论流派的主要观点、国关大师的生平轶事如数家珍，或许会在出租车司机侃侃而谈国际大势时失了与之争辩的兴致。但南开国关教会的那份踏实严谨、精益求精，恰如“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相信会是刻在我们心间的永久纪念，也会成为我们在未来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砥砺践行的准则。

告别更是“莫忘来时，莫愁前路”的传承。在这个学生自办刊物艰难进取的时代，正是有院系活动时踊跃提问、认真记录的通讯员，访谈、约稿时整合资源、排除万难的小记者以及审稿校稿时咬文嚼字、“鸡蛋里挑骨头”的主编、责编的辛勤付出，正是有热心给予我们肯定、鼓励，批评、建议的师长朋辈的来信来稿，《新视界》才幸运地走过了三年又半载。挥手作别的时刻，惟愿将满满感谢与深深祝福献给各位编者读者——每一期、每一步的调整、完善，离不开各位的添砖加瓦；前路漫漫里，也愿这份对国关的热望能够不减这份对刊物的专注得以传承。

临别一帖，不舍才下眉头，怀恋犹在心间。整装再出发的时刻，不失了不断拓展“新视界”的意愿，也不忘增长探索“新世界”的能力，愿与君共勉。

徐芳宇
2013年6月



新视界

NEW VISION

南开大学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国际关系系 主管
《新视界》编辑部 主办



2013 年夏季号
【总第 14 期】
2013.06 出刊

主编：姜忆楠

本期执行主编：沈 琳

副主编：曹 滢 董柞壮
郝丽君 吕 海 曹 滢
孙 迪

编辑部成员：

陈一一 程 康 郭晓琼
李家胜 李金潼 刘芮宁
刘雨晨 马焱粮 彭紫嫣
任 娟 石 宇 孙 跃
王宝盆 王芳琳 徐芳宇
杨 雪 于凯玥 张晓康
赵姝婧 赵 政 左锦涛
胡阳阳 李 漩 李安琪
李冰莹 宁鹏举 裴 瑶

封面设计：曹 滢 刘芮宁

目 录

编者的话..... (I)

学人访谈

朝鲜问题与半岛局势变化 马得勇 (1)

学术论文

共同利益中的冲突偏好：贸易摩擦中的中美非合作博弈
..... 何 睿 (7)

国关人物

安德鲁·莫劳夫奇克 郭晓琼 任 娟 宁鹏举 (26)

他山之石

模拟外交决策过程与本科生教学
..... 朱莉·洛金斯 (29)

聚焦

第二届全国研究生自办学术刊物研讨会 袁 松等 (37)

沃尔兹追思会 张睿壮等 (45)

2013 届毕业生特辑

经验分享 权贤美等 (58)

毕业感言 (67)

恩师寄语 (69)

国际关系系 2013 届部分毕业生毕业去向 (70)

目 录

英采飞扬

靖国神社问题述评 陈佳迪 (72)

钓鱼岛问题述评 冯晓璇 (73)

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周 正 (73)

新书架 (二) (75)

院系活动

系内新闻 (78)

校外短讯 (82)

国际关系系科研简报

南开大学国际关系系科研简报 (83)

国际关系中文核心期刊最新论文篇目信息 (84)

国际关系英文核心期刊最新论文篇目信息 (87)

读编往来 (93)

国际关系系论文注释体例 (94)

征稿启事 (100)

刊物简介

《新视界》(季刊)于2010年6月改版创刊,由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主管、《新视界》编辑部主办。本刊秉承“知识性、交流性、原创性”原则(张睿壮教授语),在学院领导、教师的悉心支持下不断发展、壮大,也得到院内外师生、校内外读者的关注与好评。

《新视界》编辑部下设编辑处、秘书处和宣传处等部门,由不同专业、年级在校学生组成。编辑部成员以“我的视界我做主”为理念,旨在以此为平台,活跃学术氛围、引导学术思辨、推动学术争鸣,为国际关系学科的研究者、学习者、关注者开启“新的视界”。

编辑部倡导“立足于南开,但又不限于南开”,热忱欢迎校内外和国内外学人、师生来稿来函,为刊物发展提供宝贵意见和强劲动力。

通讯地址:

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94号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国际关系系 《新视界》编辑部
(300071)

邮箱:

newvision@mail.nankai.edu.cn

网址:

<http://nknewvision.yolasite.com/>

朝鲜问题与半岛局势变化

——访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马得勇副教授

【编者按】作为国际舞台上的热点地区，朝鲜半岛局势一直十分引人注目。最近一段时间，朝鲜的一系列动作让世界对该地区的关注度不断上升。对于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以及朝鲜很多看似“非理性”的行为，我们心中也多有疑虑：朝韩双方历史上经历了怎样的互动？朝鲜核试验是为了转移内部矛盾还是单纯彰显实力？韩国新政府成立不久，金正恩上台也只是一年多时间，两位“新任”领导人之间的互动是否会不同于以前的模式？作为学习国际关系的学生，我们在分析国际热点问题时应注意哪些问题？为此，我们对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的马得勇老师进行了一次专访，请他以他的视角来分析上述问题。

【人物简介】马得勇，韩国首尔国立大学博士，现任教于南开大学政治学系。主要的兴趣点是比较政治、社会资本、政治信任、中国基层民主与治理、朝鲜半岛政治与外交。主要著作有《东亚地区社会资本研究》，并有多篇优秀论文。

《新视界》：近年来，朝鲜半岛问题一直受到国际社会的持续关注。您对朝鲜半岛局势的历史发展有哪些看法？朝韩双方的互动经历了哪些阶段？

马得勇老师（以下简称“马”）：讲到朝鲜半岛的局势，应该从冷战说起。朝鲜半岛的局势是冷战的产物，是冷战的主战场。朝鲜战争之后，朝韩之间一直处于敌对状态，双方存在体制、经济发展等方面的竞争，相互之间小规模敌对行动从来就没停止过，派间谍等行为一直都有。比如，在三八线附近有一个地道，是朝鲜当年挖掘的，已经挖过了三八线，并且宽到容许坦克通过，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韩国才发现这个地道。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竞争中，朝鲜是占优势的。一是朝鲜的经济发展比韩国要好，因为当时有苏联、中国的支持，而韩国当时的经济发展不行。但冷战结束后，朝鲜失去了外援，经济下行，而韩国七八十年代经济则发展很快，因此冷战结束后双方经济对比迅

速发生逆转。二是在朝韩关系上，朝鲜一直觉得自己有优势。一方面它觉得韩国是战败方，另一方面认为韩国是个依靠美国支持的傀儡政权，如果没有美国支持，朝鲜早就把韩国“解放”了。这里又有一个例子：在三八线附近，朝韩两边都有旗杆，朝鲜那边的旗杆有100多米高，韩国的有60多米高。刚开始的时候，两边旗杆应该是差不多高的，后来韩国方面装修，旗杆加高了，朝鲜发现之后就也把自己的旗杆加高了，双方不断增高旗杆，后来朝鲜干脆把旗杆加到100多米高，韩国最后作罢，没再继续加高旗杆。在韩朝关系中，朝鲜是占心理优势的，因为首尔离朝韩边界很近，只有40公里，朝鲜的远程火炮是可以直接打到首尔的。朝鲜认为如果它想打韩国，首尔就是它的人质，所以朝鲜不怎么搭理韩国。

不过，在冷战结束后，朝鲜经济衰落，这一方面的优势就没了。体制方面，在朝鲜看来，中国跟苏联一样是走了修正主义道

路，只有朝鲜走社会主义道路，因此朝鲜在体制方面的生存危机意识特别强。朝鲜有很多外交行动，包括核试验，都与其生存危机意识有关。在 1994 年之后建立的金正日体制，总体上来说与金日成时期没有太大变化。在经济问题加剧以及外部环境剧烈变化的情况下，核武器开发成为对于它的体制合法性来说很重要的东西；另一方面，朝鲜的核计划在金日成时代就已经存在，只是因为苏联的压制而没有明目张胆地公开进行。

1994 年时爆发了第一次核危机，谈判的时候（朝鲜）要求每个国家提供援助、提供重油等。2005 年又爆发了第二次核危机，我认为有一个原因是，朝鲜一直以来把拥有核武器当成它的梦想；在韩国，有人认为制造核武器是金日成的遗训。朝鲜想做大国，有核则是大国的标志。

《新视界》：在您看来，朝鲜核试验是为了转移内部矛盾还是单纯彰显实力？

马：就朝鲜目前的体制来说，在开发核武器上的对内考虑更多一些，因为它要维持体制的合法性。开发核武器可以增强国民自信心，他们会认为在金正日、金正恩的领导下朝鲜成为了一个强盛大国。可以说，核武器起到了动员的作用，增强政权的凝聚力。如果什么都不行，那么人们为什么要支持你呢？朝鲜现在经济困难，就只能从别的方面，像核武器、导弹等方面找自信。

有人说朝鲜更多的是外交上的考虑，是为了要援助。但在我看来，这都是次要的、派生的，最主要的还是国内的需要。也有的人认为是金正恩刚上台，太年轻了，需要稳定国内。虽然也有这个考虑，不过朝鲜核计划从金日成时期就开始了，第一次、第二次

核危机也都是在金正日时期。金正恩上台后，在外交上的基本立场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所以我认为，朝鲜核试验主要是针对国内。如果它有制度自信，它就没有这个需要；如果它不担心政权崩溃，它就没必要做这件事情，或者说必要性没有这么迫切。再者，韩国也有能力造核武器，但它经济上发达，而且它有民主体制支持它的政权，它没有这个迫切性。所以说，朝鲜核试验主要还是出于国内考虑。

不过，核试验也与外部因素有一定的关系。例如，第二次朝核危机爆发与美国对朝政策有很大关系。布什时期美国把朝鲜称为“邪恶轴心国家”，并且必要时要动用核武器清除这个国家，特别是伊拉克战争的爆发，这些给了朝鲜很大的刺激。它认为，伊拉克就是因为没有核武器所以美国把它“干掉”了，如果自己拥有核武器美国就不敢了。美国在这件事上起到的最重要的影响是，它把一个没有核武器的国家给干掉了，而且它常常把伊拉克、伊朗、朝鲜并列为“邪恶国家”，这对朝鲜来说是一个很危险的信号。

《新视界》：您在韩国遇到过“脱北者”吗？能谈一下有关“脱北者”的问题么？

马：我遇到过脱北者，但是没有直接的接触。我参加过关于他们的学术会议，听过他们的发言。很多脱北者其实希望朝鲜崩溃，因为他们有很多亲人可能还在朝鲜坐牢。有人说这表明朝鲜有一部分民众对于朝鲜政权不是很认同。不过我认为没有逃出来的人对朝鲜政权的认同比例还是比较高，因为在那种体制下，不管是出于恐惧还是其他的原因，如果你不认同的话，你的境况就会比较危险。

《新视界》：脱北者的不认同感是因为亲身经历还是别的国家“和平演变”？

马：脱北者逃出来更多的是因为生活不下去，或者在监狱里受过劳改。朝鲜常常称赞本国体制的优越，然而现实的困难和心理上的落差给国民心理上带来了不平衡的感觉。国民受到迫害的时候，尤其是在他们没有做错事情的情况下，对人们的心里造成了非常负面的影响。另一方面来说，这些人没办法被外国“洗脑”，因为朝鲜与外交的交流基本被切断了。朝鲜是一个封闭的国家，“和平演变”不太可能。

《新视界》：脱北者在韩国的生活状态如何？会有人提供特殊的生活补贴和安全保护吗？

马：韩国政府负责这些脱北者全部的生活费用，比如说住房基本生活的补贴等等。特殊的政治人物还会受到安全保护，比如说1997年逃出来的黄长烨，即朝鲜前宣传部长，主体思想的创造者。朝鲜一直想暗杀他，所以他受到了特殊的保护。不过现在韩国有几千名脱北者，对于大部分脱北者韩国政府只是提供生活资助，同时这些人也造成了财政上的负担，因此实际上韩国并不愿意无限度地接受脱北者，但是面对国内团体施加的压力不得不继续提供补贴。脱北者中也不全是很听话的良民，有的会偷盗抢劫，给韩国社会带来不良影响。不过韩国国内民众一般都是比较友好的，对脱北者表示同情等。此外，脱北者也是有圈子的，面对陌生的环境，有的人会迷失迷茫，会有心理上的困惑。生活上，很多脱北者没有一技之长，年轻的人可以上大学，由政府资助，就业较好，年纪

大的则不太好。但总而言之，脱北者的问题在韩国不算是太严重的问题。

在中国，中朝边境有比较多的脱北者，有人估计大约二三十万，分散在很多朝鲜族的村庄中。中国人对脱北者的处理方式一般是“睁只眼闭只眼”，有的人通过和中国人结婚留下来，有的则是过来挣到需要的钱再回去。脱北者在中国就是“黑户口”，很多权益得不到保障，比如他们打工的时候雇主拖欠工资，但是没有法律保障。

《新视界》：朝鲜国内生活水平如何？

马：很难想象。我曾经写过一篇关于朝鲜粮食的文章，朝鲜现在还基本处于吃不饱饭的状况。不过不同地区、不同阶层情况不一样。平壤情况较好，有援助的粮食先分到这里。相反，咸镜道老工业地区由于不生产粮食，情况很糟糕。

2001至2002年，朝鲜开始尝试一些体制上的改革，最先进行了货币改革，但并不成功。现在朝鲜有些集体农场，会定期召开市场进行交易。但是朝鲜没有实行土地改革，现在改为几户人家一起进行耕作，效率不高。另外朝鲜农业技术落后，农业发展缓慢。朝鲜的粮食是配给制，因此也很难留余粮。

《新视界》：根据您的了解，您能否介绍一下朝鲜政权的人事调动，以及朝鲜国内的政治局势？

马：在金日成时代，朝鲜内部有很多派别，例如莫斯科派、延安派、游击队派等等，朝鲜战争后，游击队派取代了其他派。在金日成体制后期，基本上就没什么派别之分了，金正日之后就更没有什么了，通过长时

间的个人崇拜、洗脑，国内基本上没有什么反对派了。

《新视界》：最近，韩国新政府刚成立，金正恩上台也才一年多，据您的观察，这两个较新的政府在政策走向上有没有什么大的变动？

马：现在的朝鲜半岛问题，不是朝韩问题，而是朝美问题。从金正日时代开始，朝鲜问题就一直存在于朝美之间，而不是朝韩之间。朝韩关系在金大中时代是比较缓和的，因为金大中朝朝鲜采取的是比较宽容的政策，跟金正日的关系也比较好，而后来的卢武铉其实也延续了金大中的缓和政策，对朝鲜也采取包容性的“阳光政策”。正好在卢武铉执政的时候就发生了朝核问题，因此可以看出朝核危机的发生不是因为韩国，而是因为朝鲜和美国之间的关系恶化了。9·11之后，布什强硬的外交政策刺激了朝鲜。而朝鲜本来一直也没有打算放弃核计划。伊拉克战争之后，朝鲜感到做大国必须得有核武器，所以朝鲜两边都不想放弃：一方面，它不想放弃核武器，另一方面，它还想跟美国搞好关系。可是美国不能接受这种情况。在第二次核危机发生的过程中，最早是美国的副国务卿凯利（James A. Kelly）去朝鲜和金正日谈，金正日提出要美国承认朝鲜的核计划。之后美国就开始制裁朝鲜，掐掉对朝援助，然后两方矛盾升级，一来一往就成了现在这样。

关于朝美关系不能缓和的原因，有一个解释是美国不想缓和与朝鲜的关系，也就是说美国不想让东北亚成为一个和平的地方。因为美国着眼的是全球战略，东北亚可能不是它的全球战略重点，至少在2000年以来

的一段时间不是它的重点，美国的重点一度在中东。所以美国当时对金正日和好的信号置之不理。不过中韩两国很希望朝美两国的关系和好。在出现核危机以后，韩国政府包括总统在内，曾经在不同场合批评过美国，指出核危机的发生与美国的外交战略有很大的关系。虽然美韩是同盟关系，但是由于美国有它的全球战略，因此并不听韩国政府及其游说集团的劝说。美国认为，一旦朝韩关系缓和，那么美国在韩国的驻军就得撤退。在朝韩关系最好的时期，韩国国内要求美国撤军的呼声还是很高的，所以美国对此有更深层的战略考虑。

李明博时期的韩国对朝鲜外表看来很强硬，其实也仍然希望和朝鲜展开对话合作。朴槿惠上台以后，虽沿袭韩国保守派的政策，但是在朝核危机不断加剧的情况下，并没有采取十分强硬的措施，依然积极寻求朝美之间的妥协和对话之策。在朝核问题上，韩国仍然与中国的立场最为接近。

有人说美国这样也是想给中国制造麻烦，其实这不仅仅是针对中国，这是针对东北亚和东亚地区的战略格局问题。美国不能从韩国撤军，撤军就等于势力范围缩小了。朝韩之间的关系比较缓和的时候，韩国一直在安排美军撤军的时间表，并削减驻韩美军，美国对此十分不满。美国其实是想控制全世界，美国的撤退即意味着中国的进入，因为朝韩关系缓和了以后，朝韩双方都会加强跟中国的关系，所以在东北亚美国当然不能撤退。除了这一层战略考虑，美国在对朝关系上还很傲慢。金正日希望得到尊重，美国视而不见，美国不希望这样一个在它看来“无赖国家”与自己平起平坐。至少布什

是这样想的，布什是不可能把金正日当成一个正常的国家首脑来看的。在小布什当政时代，叫不叫金正日“先生”都被看作是美国政府对朝鲜立场是不是有变化的一个表现。他之前从来都不叫金正日“先生”，曾经有一次说话的时候用了，有人解读说美国释放了一些善意出来。所以从美国的角度，美国没有跟朝鲜缓和关系的欲望，反正朝鲜造核武器，中国也紧张，日本也紧张，韩国也紧张，不管哪个国家紧张，都离不开美国，而且目前美国并不担心朝鲜的核武器会对它有多大的威胁。

《新视界》：老师，有人曾经认为中国、朝鲜之间的关系并不像以前那么紧密了，那么现在中朝关系是怎样一种状态？

马：在过去，中朝关系亲密，这主要有两点原因：一是它们体制相似，二是金日成等朝鲜领导人与我们很熟悉。现在，领导人不一样了，中国对朝鲜也不是无条件援助了。中国自身也需要发展，就不能提供给朝鲜过多的援助，因此给朝鲜的援助就减少了。另外，国家领导人之间的人际关系也淡漠了，两国领导人互动时考虑更多的是国家利益问题。另外，朝鲜对中国的制度变化非常不满，认为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朝关系疏远是必然的结果。

《新视界》：之前中国也提出了对朝强硬的说法，那么中国会不会“抛弃”朝鲜？

马：目前来说还“抛弃”不了。现在中朝关系实际上很不融洽。对朝鲜来说，谁都靠不住。它从抗美援朝开始就没相信过中国。而且1958年是朝鲜逼迫中国撤军，朝鲜认为中国没安好心。当时很多志愿军就在朝鲜结婚了，现在好多都回来了，有些脱北

者可能就是以前的志愿军。但是中国仍然坚持援助朝鲜还是有战略上的考虑的，毕竟朝鲜是中国的战略缓冲地带。

《新视界》：《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第二条规定：一旦朝鲜受到安全上的威胁，中国就必须出兵援助。但是前一段时间，国防部在回应关于这个协定的问题时，并没有给出正面回答。假如朝韩战争爆发，中国会怎么应对？另外朝鲜现在这种看上去很不理性的外交决策是由什么造成的？

马：关于同盟协定这类文件，在国际上并不乏违反的情况，毕竟同盟关系不可能永远是同盟关系，如何应对要根据国际局势做决定。

一个人特别没有自信的时候就会表现得特别自大，朝鲜现在的外交局面就是这样。因为朝鲜对自己的体制没有自信，所以它特别看重自己外交上的“面子”，这是其心理上的需求，不是领导人自身的，而是基于政权考虑的需求。所以如果美国能够看重它，热情地接纳它，那么它就能以此作为宣传来维护其政权。

《新视界》：现在朝鲜不断宣称自己在进行核试验，目的是不是要引起世界的关注，从而与美国签订和平协议呢？

马：朝鲜确实要引起美国的关注。朝鲜现在是“鱼与熊掌都想得”的状态，就是核武器也想要，而且同时还想要别的国家承认其政权，与其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

《新视界》：老师认为朝鲜会出现民主化的趋势吗？

马：民主化是不可能的，说得夸张一点，朝鲜人民饿死也不会起来反抗，朝鲜的政体从内部崩溃的可能性不大。因为朝鲜人民的

意识形态被扭曲得很严重，而且相互之间存在监督，包括父母、子女之间都会相互揭发，所以不会发生大规模的反抗。很多美国学者推测朝鲜在目前的经济状况下会出现人民的反抗，那是因为他们不了解朝鲜国民，他们是从本国国民的心态进行推测的，所以说

不准确。
《新视界》：最后，还想请老师提供一些学习指导，例如我们在分析国际形势时要注意哪些事项，以及在分析方法上要注意些什么？

马：对于国际关系研究来说，最重要的就是知识和信息的积累。知识就是分析国际关系的各种理论，这个是基本要素，必须要掌握。另外，在研究某一个国家或某个地区时，要熟悉其内政外交，甚至要掌握其语言。当然，假如你想成为像肯尼思·沃尔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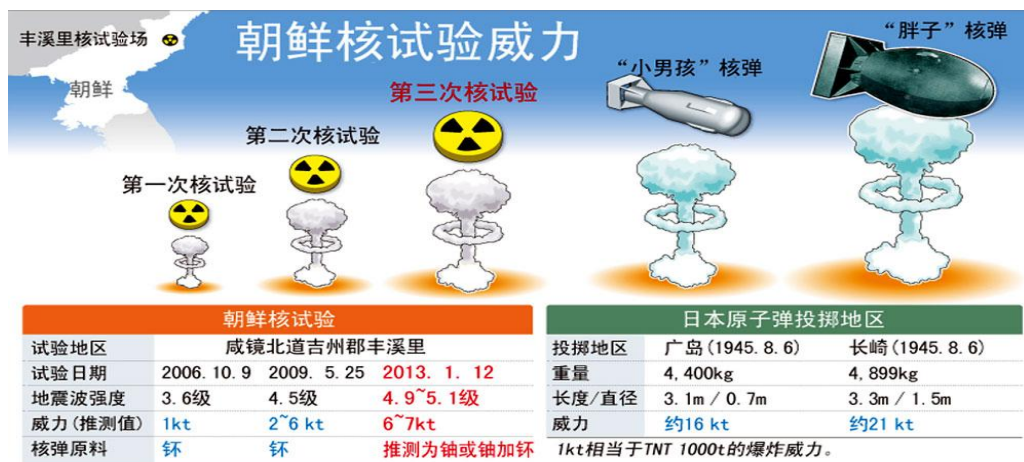
(Kenneth N. Waltz) 一样的理论家，那就不必要掌握各种语言。但是如果你想成为地区问题的专家，就必须在英语之外还要掌握当地的语言，这样你才能掌握该国的信息细节来判断其外交动向。比如你在判断一个人的倾向意愿时，会观察他的表述以及面部表情等，同样，在分析外交政策时，我们不仅需要观察某个国家的外交发言人或其外交机构在说什么话、如何表达，而且要了解该国的舆论、学术界是怎么想的，该国的内部政治如何发展，这些国家的学术界、政界人士私下如何与外国沟通等等，通过这些信息，才能得出可靠的结论。就拿朝鲜问题来说，每个人都可以进行分析评论，但分析评论是否合理、接近现实，是与你掌握信息的程度密切相关的。你掌握的信息越丰富，你的分析就会更准确，更靠近事实。

[整理：陈一一、郝丽君、刘芮宁、王宝盆、赵姝婧]

[责任编辑：吕海]

..... 图画欣赏

朝鲜核试验威力：(资料来源：凤凰网)



[整理：宁鹏举、孙跃、王宝盆、赵姝婧]

共同利益中的冲突偏好：贸易摩擦中的中美非合作博弈*

何 睿**

内容摘要：中美贸易所产生的共同利益，并不能缓解两国在贸易领域的利益冲突。伴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在贸易领域向中国发起了日益频繁的挑战。本文以中美相对地位为视角，指出地位差距、地位差异和地位认知三个要素在相对状态和变化幅度两个维度中影响着中美在经贸领域的利益争夺。根据中美在贸易政策上的不同偏好，本文使用非合作博弈作为分析框架，建立了中美贸易摩擦的博弈模型。该模型说明在贸易摩擦中，中美在确保共同收益的基础之上，就冲突的偏好展开了一系列的策略行动，其中先发制人并宣称强硬的一方更有可能获胜，而相对地位三要素对强硬的效果和置信度的高低具有重要影响。

关键词：相对地位；贸易摩擦；非合作博弈；置信度

相互依赖的深化与其发展的不平衡性是经济全球化表现的两面，这使得大国关系有着不同于冷战时代的特点。一国经济状态的各个方面，诸如工业与服务部门、收入和就业水平、生活水准等等，都会影响到其贸易伙伴的经济水平；^①与此同时，资本跨国流动的加速使国家对本国经济的控制能力减弱，其经济水平更易受到国际环境的影响。一方面，这种影响在国家间的分布是不平衡的，市场经济总会令一些国家付出代价，并让一些国家获益更多或更少。^②另一方面，这一影响在一国内各部门之间的分布也是不等的，从而使国家运用某个领域的优势来弥补另一领域的劣势成为可能。^③这些事实使得国家具有更强的介入经济事务的动力与能力，导致一国对外贸易政策的制定愈发难以同权力因素相分离。^④因此尽管自由贸易的红利为国家展示了广阔的合作前景，但由于冲突偏好的存在，顽固的保护主义和激烈的讨价还价始终随行于国际贸易的发展和相关机制的构建。^⑤

一、问题的提出

经济全球化的双重影响同时强化了涉及国际合作的两个重要概念——共同收益与相对

* 本文部分内容曾于第五届“全国国际关系、国际政治专业博士生学术论坛”上宣读。

** 作者简介：何睿，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学院国际关系专业 2012 级博士研究生，邮箱：herui1985@126.com。

① [美]罗伯特·凯伯：《国际经济学》（原毅军、陈艳莹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 页。

② [美]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杨宇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6 年版，第 21 页。

③ Chris Brown,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ird edition)*, New York: Macmillan Press, 2005, p. 36.

④ 尽管新自由主义反对多数形式的国家干预，但大卫·鲍德温于 20 世纪 80 年代就指出“（国家）经济战略从不会止步于其本身，它几乎总是反映着一些更高层次的政治目标，源于政策制定者对于形势的判断”。参见 David Allen Baldwin, *Economic Statecraft*, UK: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62-64. 关于这一问题的新近成果参见 Juan C. Zarate, “Harnessing the Financial Furies: Smart Financial Power and National Security,”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32, No. 4, 2009, pp. 43-59; Daniel W. Drezner, “Sanctions Sometimes Smart: Targeted Sanctions in Theory and Practice,”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13, No. 1, 2011, pp. 96-108.

⑤ 由于经济危机的影响，贸易保护主义在近年来持续升温，大国在其中扮演了主要角色，据统计 2009 年的贸易保护中有 60% 是由 G20 成员国实施的，这一数值在 2012 年上升到了 79%。参见 Simon J. Evenett, “Executive Summary,” in Simon J. Evenett ed., *Débauché: The 11th GIA Report on Protectionism*, the Centre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pp. 1-2. 与此同时，多哈回合谈判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就农业补贴、削减关税等问题僵持不下也使得 WTO 的多边贸易机制面临严峻考验。参见 WTO Annual Report 2012,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pp. 22-35. http://www.wto.org/english/res_e/booksp_e/anrep_e/anrep12_e.pdf. (最后访问时间：2013 年 5 月 1 日)。

七、结论

综上所述,中美相对地位的表现是差距不平衡、差异不对称和认知时好时坏、总体趋紧的统一。这不仅影响着双方的贸易获益函数,同时还为美国的威慑行为提供了现实可能性,中国崛起所造成的中美在地位差距和地位差异方面的变化则加剧了这一过程。随着世界经济进入后金融危机时代,中美经济关系必然向着更为复杂的方向前进。而中国的相对地位的改善一方面为自身赢得更多主动,另一方面也使自身面对日益频繁的挑战。本文博弈模型表明,在相互依赖的世界中,贸易互惠削弱了单边制裁的效果,但基于自利的共同收益并不能化解中美冲突的贸易偏好,中美会在共同收益的框架中展开激烈的利益争夺。因此,在坚持产业结构升级的同时,正视摩擦、切实增强谈判能力,是中国崛起之路上必须经历的试炼。

[整理:刘芮宁]

[责任编辑:程康]

..... 政治吐槽

“囧司徒”——乔纳森·“乔恩”·斯图尔特



Jon Stewart 原名 Jonathan Stuart Leibowitz (1962—), 在中国大陆常被网友称为“囧司徒”, 美国电视主持人、演员、作家、脱口喜剧演员、媒体评论员及政治讽刺者。他主持喜剧中心电视台的新闻讽刺节目《每日秀》(The Daily Show with Jon Stewart), 用搞笑的形式讽刺新闻事件和人物, 在年轻人中广受欢迎, 并 18 次获得艾美奖(“黄金时段艾美奖最佳综艺/音乐/喜剧节目奖” 2003-2012 连续 10 年获奖, 外加“最佳综艺/音乐/喜剧节目编剧奖” 2001-2012 年间共获奖 8 次)。他亦曾两度主持奥斯卡金像奖(第 78 届及第 80 届)。虽然《每日秀》是标准的“假新闻”, 但是“囧司徒”用其敏锐的政治嗅觉和高超的“反驳手法”, 被评为“全美最受信任的人”, 其政治影响力可见一斑。

[整理: 宁鹏举、孙跃、王宝盆、赵姝婧]

安德鲁·莫劳夫奇克

【编者按】安德鲁·莫劳夫奇克作为欧洲一体化理论自由政府间主义的独立提出者，在欧洲研究方面有着极深的造诣。他的著作《欧洲的抉择：社会目标和政府权力》被称为是该领域“最重要的作品”。本文主要介绍其自由政府间主义理论，并对他的其他方面的研究作了简要介绍。

学者简介

安德鲁·莫劳夫奇克(Andrew Moravcsik),生于1957年,现任普林斯顿大学欧洲项目主任,也是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1992年至2003年任教于哈佛大学,2004开始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教学和研究领域包括欧洲一体化、跨民主、人权、亚洲区域主义、国际组织、谈判分析、国际关系理论、欧洲对外政策和跨大西洋关系、军事工业全球化以及定性/历史的分析方法。在进入学术圈之前,他曾任美国政府贸易谈判员、韩国副总统的特别助理、华盛顿外交政策期刊编辑并担任其他公众和咨询职位。曾任《新闻周刊》特约编辑,现任《外交事务》编辑并且不时在《金融时报》、《纽约时报》、《展望》和



《外交政策》等杂志上发表文章。同时作为一个乐评人和学者,他也在戏剧领域发表过作品。他曾出版著作《欧洲的抉择:社会目标和政府权力》,并且发表章节、论文和评论等超过125次。

一、自由政府间主义

莫劳夫奇克潜心研究了欧洲地区走向经济和政治共同体的历史。关于欧洲走向一体化进程的原因,现在已经有了很多推断,包括出于对国家安全的担忧,联邦制理想的强大力量,政治企业家的技巧使然,又或者是技术专家的胜利。莫劳夫奇克不同意上述观点,他认为经济相互依赖是促使欧洲国家走向联合的源动力。

莫劳夫奇克将其理论称为自由政府间主义,把关于优先选择形成的自由主义理论同对成员国之间艰难讨价还价的政府间关注进行了全新的综合,对斯坦利·霍夫曼等人的政府间主义进行了一定修正,以解释在欧盟框架下进行的政府间讨价还价的性质和欧盟的发展演变。

自由政府间主义的核心是三个要素:关于理性国家行为的假定、国家优先选择形成的自由主义理论、国家间谈判的政府间主义分析。莫劳夫奇克运用自由主义的多元主义理论来分析确定一国对外行为的国内政治过程,关注国家—社会的关系在形成国家偏好方面的作用。在这个阶段,成员国国内经济、社会行为体产生了对欧盟经济一体化的需求,是对一体化的需求而不是超国家制度的供给决定了一体化的进程。当对一体化的需求形成之后,政府就会带着各自的国家偏好进行政府间的谈判,满足这种需求。在国家间谈判阶段,莫劳夫奇克又

从多元主义的自由主义重新回到了现实主义的一些主要假设立场上，自由政府间主义认为是成员国相对权力决定了一体化进程中收益与代价在成员国间的分布，最好地解释了欧共体国家间谈判的结果。

在一体化的第三个阶段，即制度选择方面，莫劳夫奇克在机制理论的基础上指出，欧盟经济一体化中出现了不同于其他国际制度的主权委托现象，其目的是为了保证各国在谈判中所做出的承诺具有更大的可信性。主权汇集和委托被各国政府当作一种“手段”，来确保其他国家的政府将接受已达成的立法并加以贯彻，来表达本方承诺的可信度，或者将自己拴定于未来决定以防备来自国内的反对。在对欧盟经济一体化研究中，莫劳夫奇克关注的是欧洲经济一体化的进程，理论的探讨也围绕与其他有关经济一体化的各种理论的争论。尽管历次重大谈判的研究中都或多或少地涉及对外政策一体化的问题，但是他很少对这一问题领域进行正面的理论探讨。

自由政府间主义对于一体化理论的贡献在于其分析欧盟内的讨价还价时将自由主义优先选择分析和政府间分析结合起来，从而得出了对欧盟的理解和对几个层次、多个阶段的综合分析。这种结合帮助我们用自由主义理论来理解欧盟成员国以经济促动的优先选择。

当然，自由政府间主义也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首先，自由政府间主义对一体化进程中许多重要因素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其次，自由政府间主义过于强调国家的作用，其对国家理性的假定在实践中也会遇到例外情况。此外，自由政府间主义假定在互动和讨价还价过程中成员国政府的优先选择是固定不变的，这与实际情况不符。再者，自由政府间的理论体系缺少了反馈这一必要环节，没能论述欧盟系统中作为决策之后果的政策反馈的重要意义。最后，莫劳夫奇克低估了欧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超国家行为体，比如欧盟委员会、欧洲法院和跨国行为体即欧洲跨国公司所施加的影响。

二、其他研究议题

（一）民主赤字

“民主赤字”是他在有关欧盟的文章中经常提到的议题，这一议题起源于欧盟改革的重要文件《里斯本条约》。《里斯本条约》是欧盟为促进欧洲一体化而制定的自身改革方案，它于2007年10月19日在欧盟会议中通过，随后交由各成员国批准，但爱尔兰的全民公决否决了这个条约。此次事件被称作“民主赤字”，意指欧盟作为一个一体化组织，缺乏欧洲各国公民的民主支持。同样被提及的还有《欧盟宪法》的未获通过，这两个事件似乎与欧洲一体化的总体趋势是相违背的。但是，他认为在既有民族国家和欧盟多层次治理的实践下，欧盟存在“民主赤字”这一论断证据不足。在他眼中大多数评论家将欧盟的民主与国家内部的直接民主或议会民主相比较，而不关注欧盟多层次治理下产生的实际功能效果。如果关注的话，则可以看到欧盟的决策过程是与当代民主实践相适应的。只要这些政治程序与现存的国内民主相适应并且程序公正，那么就不能在未亲身参与欧盟政治过程的情况下对欧盟的合法性作出一些消极的评价。此外他还认为扩大直接参与并不会增加公众的问责，反而会损害

公众对欧盟的维护、好感和信任。

(二) 民主政治与国际合作

莫劳夫奇克还关注了民主政治与国际合作之间的关系。当代关于国际合作的理论大多将国家看作一个单一行为体，因此大多主要关注合作的功能收益或者国家遇到的集体行动问题，而很少关注国际机制与国内政治的因果关系。而他则认为国际合作会影响国内政治。国际合作会影响国内政治力量和资源的重新分配，允许国内决策者放松对国内立法机关、利益集团其他社会行为体的限制和约束。国内政治中的主动权、机构、信息以及思潮都会被重新构建。这些转变可能会使国内一些政治行为体收益，但是不见得对控制国际谈判和合作的渠道的当权者来说也是一件好事。这些国内转变也会反过来影响国际合作是的讨价还价，影响国际合作的结果，通常会使国际合作变得更容易。他认为这个理论恰好证明了欧盟理事会并不是分散了主权国家的权力，朝向一个超国家或者次国家的组织发展，而是在机制构建的过程中也会受到相应的国内刺激。

(三) 多边主义

多边主义也是莫劳夫奇克关注的一个议题。传统观点总认为国际组织会损害国内民主，而他则认为多边主义反而能够优化国内民主进程，甚至在那些民主建设已经相当完备的国家。他认为多边主义机制可以帮助少数者对抗特殊利益群体，保护弱势群体，增强国家即使是拥有健全民主制度的国家对民主决策的认识，将各种形式的治理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也帮助去除在应对公众议论和批评时的机械流程，使一些代表公正和专业观点的主体也能对促进民主有所帮助。同时，他也并不否认国际组织有时也会损害国内民主。比如有时也会偏袒特殊利益群体，损害人权等等。但是从一个中立的角度来看，认识到国际组织对国内政治能够产生积极效果也是十分有意义的。

(四) 其他领域

除了对欧盟及国际组织的民主的研究外，莫劳夫奇克还关注了国际人权机制的起源和进化，将其与自由主义理论和西欧的现实进行联合解释；关注了美国的单边主义和人权问题，研究了美国的人权困境；在国际法问题上用自由主义理论探讨国际法，探讨合法性的概念及国际法解决跨国争端的合法性问题。除此之外，他还对自由主义、现实主义、建构主义、后现代主义以及双层博弈论等国际关系理论做了大量的探讨。

[编译：任娟、宁鹏举、郭晓琼]

[责任编辑：郭晓琼]

模拟外交决策过程与本科生教学

朱莉·洛金斯*

摘要: 本文认为, 对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进行模拟, 可以帮助教师把学生对复杂的政治事件、环境和决策的抽象认识与多种因素在决策中相互作用的现实世界联系起来。这样一种主动学习的模式有助于将学生的抽象理解带入具体世界之中。学生可以成为学习过程的积极参与者, 而非依赖于教师讲授的被动学习者。

关键词: 模拟; 外交政策决策过程; 本科生教学

对于许多本科生而言, 尽管在抽象讨论中能够理解决策过程的复杂性, 但在考察实际事件和状况时, 他们并没有全盘考虑政治决策和行动。比如, 虽然学生们可以抽象地思考领导人代表选举团的各个部分, 以及他们如何对这些团体中的不同部分负责, 但他们在考察实际政治状况时常常忘记这一点, 并且明显过分简化了异常复杂的政治事件。对外交政策决策过程进行模拟, 虽然也是一种简化的表现方式, 但可以帮助教师把学生对复杂的政治事件、环境和决策的抽象认识与现实世界中决策所牵涉的多种因素相互作用联系起来。这种主动学习的模式有助于把抽象的理解带入具体的世界之中。学生是学习过程的积极参与者, 获取经验性的知识而非依赖于教师讲授的被动学习者。模拟可以增强学生对所学问题的兴趣, 鼓励同学之间进行互动和合作。

为何采用模拟方法?

作为一种标准教学工具, 模拟方法的应用已有几十年之久, 近来的研究表明, 跨世纪一代(生于1980年后、2000年后高中毕业)能够更好地适应将分组活动与学习相结合的学习环境以及具体的学习方法。本文讨论到的这种模拟方法可以适应这一代人的上述两种需要。年轻学子们可能比老一代更难以接受以问题为基础的学习, 但是有关跨世纪一代学习风格的研究表明, 情况可能不再是这样。今天的大学生平均都是跨世纪一代, 比之前的那些学生更能够接受以问题为基础的学习, 因为这些活动是以学生为中心的, 让学生更大程度地控制学习过程。

在良好的以问题为基础的学习情境中, 模拟方法能够达到最佳效果, 这是因为它们:(1)生动形象、面向现实世界;(2)结构模糊而且复杂;(3)产生多种假设;(4)需要团队协作;(5)符合预期的学习结果;(6)建立在先前的知识和经验基础上;(7)有助于高层次认知

* 本文原载于美国《政治学与政治》杂志2009年4月号(*PS: Political Science & Politics*, Vol. 42, No. 2, April 2009, pp. 401-407)。朱莉·洛金斯(Julie A. Loggins), 美国西卡罗来纳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系助理教授。原作者感谢萨莉·汉森(Sally Hansen)对这种模拟方法的开发所作的评论与持续反馈, 以及她对多份初稿的评论。另外, 作者感谢南卡罗来纳大学政治学系提供了许多教学机会, 使得作者得以在课堂中开发、提高和使用这种模拟方法。参与模拟的学生们提供了必要的反馈使其得以进一步完善, 后来者应该承认他们贡献的宝贵经验。最后, 但绝非不重要, 作者要感谢两位匿名评阅人和《政治学与政治》的编辑提出的宝贵批评、评论和帮助。

技能的开发。

过去 15 年的认知科学研究表明，传统上以讲授为基础的课堂环境并不能让学生达到最佳学习效果。尽管以问题为基础的学习从 20 世纪 60 年代就开始用于对医学生的教学，并不算一种全新的方法，但它得到了近来的认知科学研究的支持。因此，从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开始，高等教育出现了从教育到学习的范式转变，这也使得在本科生教学进行一个学期的模拟计划变得更加突出和有效。

从获取的知识来看，以问题为基础的学习和传统上以讲授为重点的学习之间并没有显著差异，不过，参与到以解决问题为基础的学习环境中的学生展现出将这种技巧自然地应用到解决新问题中的可能性。他们从以问题为基础的学习中获得的信息也能够保留更长时间。这表明，以问题为基础的学习能够增强批判性思维和分析技能，能够在以后的课堂和非课堂环境中继续应用，真正地培养学生。

为了充分利用以问题为基础的学习过程，本文介绍的这种模拟方法需要贯穿整个学期。尽管实际的模拟仅仅为期两天，但当这种练习能够在整个课程中进行时，学生的学习和记忆可以有更大的成功，因此笔者建议整个过程在学生的最终成绩中至少占 30% 的比重。笔者曾将这种模拟方法与传统的教学和评估方法相结合，为了提供以不同的学习风格获取知识的机会，使得课堂使用灵活的、综合的学习观点。

背景阅读

为了让学生建立先验知识，在课堂练习之前，对各种对外政策制定的理论有一个扎实的概念理解是很重要的。由于这是美国对外政策制定的模拟，学生们应该熟悉总统职位和权力、官僚机构、军队、国会、情报机构及其对对外政策的影响。他们也要熟悉经济因素、利益集团、州长以及其他政治领导人对对外政策的影响。同时媒体、选举政治的作用和公众舆论也不可忽视。除了对对外政策的影响，学生应该了解各种决策模型和理论，例如理性行为模型、理性选择理论、政府政治模式、组织过程模型、个性和信仰的作用、操作码理论（operational code theory）、危机决策理论、政府分治、CNN 的影响、多数主义、多元论、精英主义等。

课程和教育目标

因为学生往往不能搞清楚国内政府决策过程的所有复杂性，所以对他们而言理解外国的决策过程就显得更为困难，这是因为比之国内又多了许多复杂性和参与主体。模拟外国政府决策过程可以解释美国外交政策的不同方面。

下述的这几点学习目标，学生将会通过课程阅读、讲座和讨论等抽象形式接触到：

- 危机情况下压力和制约因素的影响（如时间、信息可用性和可靠性）；
- 决策过程中利益集团的作用；
- 决策过程中选举政治，选举时机和党派冲突的影响；
- 决策过程中卷入的制度冲突；

- 在某些情况下不同主流决策模型的影响（如理性行为模型、政府过程模型、组织过程模型及群体思维）；
- 决策过程中个性、信任和个人的关系的影响；
- 领导风格的作用；
- 公众舆论的本质及其作为决策工具的可靠性；；
- 决策者必须具备的丰富的关于世界政治局势的现实及历史信息；
- 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相互作用；
- 不同情况下不同政策决策解释的有效性（如精英主义、多元主义、超多元主义）

将上述所有内容结合起来，可以对外交政策决策过程的全貌有更深入的了解。虽然一些人会选择模拟设计来强调特定的目标，但上述目标或多或少体现在所有模拟上。

职位/角色选择

教师决定学生的职位应该基于以下几个准则：

1. 课程的水平如何？
2. 班里有多少学生？
3. 教师希望达到的目标是什么？
4. 教师希望包含哪些类型的问题？

一旦教师决定了所要达到目标和所包含问题的类型，那么每个团队的角色也就确定了。例如，如果教师计划以对外经济政策为基础设计模拟，那么退伍军人事务部部长的职位可能就不需要了；因此，模拟中包含的问题（至少广义的定义）要在每个团队选择角色/职位之前决定。

组织模拟

教师将用两个时长为一小时的课时进行模拟部分是理想的，这允许同学们考虑第一天的决定、开会讨论对其决策的潜在国际反应和计划未来的行动路线。如果学生在（模拟）开始时对提出的具体问题没有足够的知识和准备，也可以研究这些问题。

第一阶段：角色分配

在学期初向同学们介绍在其模拟中分配到的角色很重要，这能使他们从其模拟的角色角度开始思考。一旦团队的规模被确定了，教师应该决定谁将是团队的领导者。这可以通过随机选择、自愿或教师分配来进行。

虽然实际决策过程被简化了，每个团队的领导者还要负责编制要提交的代表整个团队的信息——计划、领导和组织可通过个人或这些可在课程管理平台得到的网络聊天室进行的集体会议。然而领导者也可以委托一个值得信赖的顾问，比如参谋长，来记笔记、收集信息，但最终提交的责任将是领导者的，这模拟了在那个决策团队中，正是领导者的能力（或被察觉到的能力）导致了政治奖励或处罚。领导者可以依靠顾问和委派任务，或者也可以尝试在

尽可能多的情况下自己处理，这是由作为领导者的那位学生的性格和领导风格决定的。

一旦确定，领导者应表明他们的政治立场和党籍。教师应该让所有学生清楚他们不是必须表明自己的党派或意识形态信仰，但他们在模拟时将不得不假定一个党派或意识形态的立场。在确定每个团队的其他角色时，应考虑到目标以及各团队会面临的问题。每个团队的角色定位相同并不必要，在模拟最后的被询问环节中，角色的多样化会更有利于比较。

除了领导者之外的所有角色都是随机选择的。团队里包括国防部长、国务卿、参谋长和国家情报总监等常规职位。其他的职位还有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和全国对外贸易理事会的主席们。从广义上讲，对学生而言，重要的一点是知道如果他们担任某个重要的任命职位，要在思想上与所在团队的领导者配合，以与任命过程的现实相一致。代表特殊利益集团的学生，应该在意识形态上代表所在的团体，不能受决策团队内其他成员的意识形态、党派构成和自己个人观点的影响。被选举为官员的学生将会被指定他们的党派关系。有趣的是，可以在不同的情况下创建统一、分裂、半分裂的政府，或者改变各团队中多数党权力的比重。对于某些政策提议而言，由于团队成员需要（提出）国会能够批准的政策边际，决策结果常常是不同的。

第二阶段：角色分配的立场文件

在角色分配后的最初几周，学生应该研究他们的职位，以理解自己的责任和权力。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应该找出所扮演角色的个人经常处理哪些类型的问题。他们也应该找出在他们的职位上当前什么样的问题处于议事日程的顶端。最后，每个学生都应该选择成为是当前在职的人还是曾经在职的人。这个选择应该由团队领导者心中的党派做出。例如，如果团体有民主党的主席，那么选择描绘亨利·基辛格担任国家安全顾问的角色就是不切实际的。或者，学生可以选择扮演一个有具体想法的个体角色，但不是一个特定的人。不管采取哪种行动步骤，学生必须明确声明在模拟中预期的价值观和行为。

学生们必须把他们的发现分享给团队的其他成员，并且阅读其他成员的文件，以确保每个人都能准确理解了每个职位以及将在模拟课程时呈现的价值观和行为。这些文件将根据学生怎样准确地展示所在职位的信息和是否清晰陈述了他们的价值观和基于所扮演角色的典型行为来进行评分。

第三阶段：熟悉角色

在实际模拟日之前，学生熟悉和适应他们将要担任的职位很重要。为了做到这一点，教师可以选择这两种方法中的一种：就像学生们在国际焦点课程上做的那样，让他们跟踪国际新闻，然后选择两个问题或事件中最小的一个，把选择备忘录交给团队领导者，或者教师挑选约 10 篇覆盖了各种各样话题的文章供学生选择，这样可以大大简化过程。但是这也在学生和模拟之间增加了一个关于当前什么国际问题更重要的偏见，这是教师更应该注意的问题。这些备忘录应该每两周由学生完成并发给团队领导者、团队成员和教师。

当完成了每个问题的备忘录时,学生应该从将要在模拟中担任的职位角度做出答复,这帮助学生更熟悉自己的职位。教师应该根据学生的角色对其表现做出评价和反馈。对这项任务的评估只能基于学生是否像(教师)指导的那样完成了任务,以及职位备忘录是否与之前学生陈述的世界观相关联。

在这个时候,学生们应该开始获得他们在各自特殊职位上应该获得的信息。例如,一位能源部长应知道美国使用的能源是由哪些类型的能源组成的(例如,石油、太阳能、天然气等),以及美国从哪里获得每种能源(如美国从加拿大、墨西哥还是科威特获得的石油更多?)。信息的类型因职位的不同而变化,教师可以帮助学生发现哪些信息对他们是有价值的,并留意在模拟过程中透露出的偏见。

此时,教师将会告知该团队的成员在职位上已经呆了多长时间,何时举行、下一轮选举,议会的党派构成,目前的民意调查结果,以及其他任何与教育目的有关的信息。这些信息在该学期的课程中更新。例如,随着特殊部门选举日期的逼近,教师应该传播更新的民意调查结果和选举预测。此外,教师可以制造团队成员不得不处理的丑闻或潜在的可耻情况。接着,教师还可以制造公共丑闻或让团队需要“有效解决了的”和将继续保密的问题。正是这类问题的增加使得模拟更加复杂,在高级班中将有更大的学习益处,但是在入门课程中这些额外的信息对学习和评价过程会是压倒性的和有害的。

第四阶段:团队战略

在实行模拟方法前的一个月,各小组应该开会讨论在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重要问题。我会建议学生依靠在学期课程中记下的选项备忘录,但是学生在决定美国面临的重要问题时,不局限于这些备忘录,尤其是如果一些问题出现在最近几周的政治议程中。局限于学期备忘录的做法将简化过程,但不会隐藏学习经历。此时在导论课中增加新问题,恰似前文提到的丑闻的增加,也更加有害。

在这些会议中,队长将会确定一个问题是否位于外交政策议程顶端的过程。但这是一个简化,因为问题的特点由不同时间和问题类型的多样的因素和变化决定。团队应为实施(模拟)提供四到六个主要的、大体清晰的目标。目标应该是广泛的、概念性的理念,如传播民主、提高石油独立性或减少恐怖主义的发生。对每个目标而言,关注的特殊地区和国家、具体的事物和行动路线都应是清晰的。此外,每个团队应为关注的地区和国家,以及行动路线提供原理。例如,如果学生决定民主传播是实施(模拟的)目标,他们可能会选择聚焦精力于非洲,特别是苏丹和索马里,因为苏丹的达尔富尔地区和索马里的伊斯兰法院联盟(Islamic Courts Union)存在不断增长的非民主的政府行为。鉴于这些国家最近被指出恐怖分子的数量增多,关注民主改革也可以与国家安全考量和减少恐怖主义的国家目标联系起来。关乎完善民主制度的具体措施可能是促进公民教育、通过人权监督的增强或在人权改善被看到或国内实行选举之后才不削减外交援助的方式促进妇女和各族群享有平等权利。正是这个过程将帮助学生脱离他们经常对美国外交政策目标过度简化的观点,

并将之转化为具体行动。

每个团队也应该确定四至六个潜在的处于美国政策前沿的问题。例如，学生也许会把伊朗持续的不遵守核计划或中东地区妇女权利扩展缺失作为潜在的问题。在每一种情况下，每个团队应确定三种优先可行的行动路线、背后的理论说明及其分歧。这有助于学生看清其行动的未来含义，帮助他们做出他们认为最好的决定。

虽然对团队来说这似乎是冗长的任务，它仍然是现实世界的戏剧性的过度简化版。团队成员共同确定主要目标、重点地区和国家以及潜在的问题，将被证明对团队有利。领导者接下来能够将细节委派给团队中擅长各个子领域的人。每组一旦完成了任务，就可以把信息呈现给团队内的其他人或领导者以获得批准，这个过程由每个队长的领导风格决定。一旦完成，每个组应向指导老师提交经营战略的一份副本给教师以供评估和用来决定每个团队将要面临的问题。

第五阶段：确定模拟问题

在老师收到了每个团队的战略后，每个团队在模拟中要表述的问题就被确定了。鉴于时间安排，每个团队可以处理约五种不同的情况，其中之一将发展为更大的情景。不是每一种情况都需要在第一次会议上提出，但我建议这时至少介绍三种情况。

在确定每个团队要处理的问题和情景类型时，每个团队的战略应该包括两到三个问题，但老师也应该选择一些之前被该团队忽视的世界的某些地区和问题来说明决策过程的真实性。话题地区和问题能够在模拟前选定，但为了更体现现实，理想做法是在模拟前一周或周末确定混合了真实事件和其他虚构、但貌似可信的事件的具体问题。

第六阶段：信息组织

一旦确定具体事件，指导老师应该开始按照谁应该接受特定的信息，把事件的顺序临时划分好。例如，财政部秘书不应接收负责侦察任务的人搜集的情报。指导教师可以通过提醒决策团队相关成员，诸如选举时间或竞选资金当前的国内形势来帮助学生处理国内政治的约束。在组织将被传播的信息时，指导教师应留意信息如何表达。教师应该意识到基于价值判断的陈述对模拟设置的影响并只传播事实，允许学生在模拟中进行任何价值判断。

第七阶段：模拟会议

在模拟会议的几天里，每一个团队都应该有一个独立的、私人的会议地点。如果教师给学生的名字、职位以及他们认为体现党派联盟的个人（如果有的话）贴上标签，这一点对于团队成员也会有帮助。每一个团队应该配有一名会议记录者，把这个团队的审议和决定传达给教师和其他团队成员。

在模拟会议期间，教师无法每时每刻都出席各组的会议。外部观察员可以进入房间，或者可以对每个团队的会议进行记录、录像或录音，这对要写评估论文的学生非常有帮助，也可以作为整个班级的教学工具。此外，每个团队也有必要设置一个或更多的外部人士，假设

他们代表的是世界上其他领导人、国际组织、利益集团、选民等,在模拟会议期间他们是有可能参与商议的对象。这是一个利用研究生专业知识的好机会。这不仅使教师得到解放,也意味着每一个团队必须与不同个性、不同哲学和意识形态信仰互动,增大了他们决策的不确定因素。

首先,每一个团队都应该有在学期初收到的团队成员的基本信息(见阶段三),他们的作用是提示当前政治状况。当信息开始流动时,教师可能希望马上发布信息给一些团队成员,以便团队能有足够的信息考虑他们可能遇到的问题,控制信息的数量和接受信息的速度,以改变压力程度。

对于每一个团队成员来说,当他们面对各种信息时,会遇到是否与其他团队分享的问题。团队成员可以选择决定接收到的信息和讨论的情况是否是相关的,或者最好在知道更多前对他们保密。要尤其注意那些可能和潜在的可耻事件相关的信息。团队成员应该小心其他人,可能是潜在的政敌,有可能也接收到同样的信息并且采取行动。

在第一场会议还剩大约十五分钟的时候,教师会通告这个团队他们需要决定要采取何种行动(如果有的话)。团队成员应该牢记模拟会议应该要包含大约一到两周的决策时间,并且在特定状况下如果毫不采取行动将会是灾难性的。一旦每个团队达成了一揽子决议,它们应该被传递给所有的团队成员。

在第一场和第二场模拟会议之间,每一个团队都要开会讨论在第一场会议期间作出的决定的可能的情况或后果,潜在的瑕疵或错误。同时,在此期间教师会评估每一队的决议、相应地进行第二场会议的事件和问题。

第二场会议应该和第一场的进程相似。教师应该提醒每一个团队在之前的会议上作出的决议,然后继续给每一团队传递信息。在第二场会议的最后,每一团队应该得出了关于如何处理他们面对的所有事件和问题的结论,并且把这些决议告知了教师 and 所有团队成员。

第八阶段:任务报告和评估

既然模拟和其他基于问题的学习活动被视作非传统教学方法,学者们建议教师也使用非传统的评价工具来评价学生。这里有几种选择,而我为这种模拟选择的两个分别是互评和自我反思。

在模拟总结之后,将以下两种信息尽可能快地传递给学生是很重要的:(1)在模拟中,将所有信息展现给了每一个团队,无论是真实的信息还是虚构的信息。(2)两场会议中所有做下的笔记。学生需要知道所有的信息,因为一些信息在模拟练习中可能没有被拿出来和团队分享。让学生知道什么信息是真实的、什么是不真实的也很重要,这样就不会不必要地警告他们或者告知他们错误的事件。学生们经常对于真实的或者不真实的事件和信息感到惊讶。学生们应该使用笔记和接收到的信息写一篇关于模拟经历的评价,并且把它们作为学习工具进行评估。学生评价的目的取决于教育目标。教师让学生写一篇对于模拟的总体评价,以及对于其他团队成员和他们自己的评价是很重要的。教师可以通过询问关于国内政治角

色、公众观点、利益集团等问题来指导评价。

总结

每次我组织模拟的时候，学生都积极反应，即使是那些之前没有像其他人一样投入的学生。它能够成为一个用于大学课堂的非常有效的工具有以下几点原因：

- 它把学生的抽象理解变成了具体的层次。
- 它提高并发展了学生有效分析和批判对外政策的能力。
- 它提高了学生在教育进程中的参与程度。
- 在课堂规模不断增大以及教育过程失去个性的时代，它鼓励学生之间的互动与合作。

所以，教师可以对付研究证明的与当代学生有关的教育问题。这种模拟是一个能增加学生教育经历、通过经历来提高信息记忆力、甚至可能提高学生对于制度的印象的有价值工具。

[翻译：马焱粮、裴 瑶、孙 迪、赵姝婧]

[责任编辑：于凯玥]

• • • • • 小幽默 • • • • •

议员的脑子

某人听说施行某种手术可以使他得到一个新的脑子，他走进医院，问医生有些什么货色贮存着。

“这是一位出色的工程师的脑子，每盎司 500 元。”

“还有什么？”

“这是一位律师的脑子，1000 元一盎司。”

“你们还有点什么吗？”

医生们面面相觑，接着示意他走到一个遮盖住的容器前面。他们轻轻地说：“这是一位议员的脑子，它每个盎司要 25 万元。”

“啊！为什么这么贵？”那人惊呼道。

医生们对他说：“首先，这个脑子几乎没有使用过；其次，你是否知道，得有多少个议员才能弄得到一盎司的脑子吗？”

[整理：宁鹏举、孙 跃、王宝盆、赵姝婧]

第二届全国研究生自办学术刊物研讨会

【编者按】2013年4月25日,本刊和《南开法律评论》编辑部的代表应邀参加了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举办的第二届全国研究生自办学术刊物研讨会。包括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在内的来自全国20多个省市的35家高校刊物、媒体参加了此次研讨会。

在为期一天的会议中,宣读了《中南宣言》,认为研究生自办学术刊物要加强相互间的交流与合作,并结合自身不断探索“组织化、规范化、专业化”道路的实践,实现研究生自办学术刊物的更好更快发展。会议中,南开大学法学院的李高扬老师代表《南开法律评论》编辑部在会议上作了以《学生学术评价的困境与出路——以法学研究生自办学术刊物的定位与特色为视角》为题的报告。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虽然该报告的题材落脚于法学专业,但在对学生自办刊物追求“组织化、规范化、专业化”具有很大的启示。鉴于此,本期《新视界》在征得原作者同意的情况下,节选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学生学术评价的困境与出路*

——以法学研究生自办学术刊物的定位与特色为视角

袁松**

研究生开展学术评价的方式有很多,编辑学术刊物无疑是最为典型和最有代表性的一种。在目前为数众多的研究生自办学术刊物中,部分采用“以书代刊”的形式公开出版发行,其他的绝大部分属内刊,不能公开出版。目前这种学生进行学术评价的方式还存在较大的争

* 由于原文具有相当部分的法学知识,考虑到《新视界》读者的知识背景大多属于国际关系学科,因此本刊对相应内容进行了删减。

** 作者简介:袁松,男,南开大学法学院2012级博士研究生,《南开法律评论》前主编。

五、结语

学生编辑学术刊物、进行学术评价是法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学术发展的内在力量,关于学生能否办好学术刊物的争议不可避免,学生编辑能做的,只有通过做出好的刊物来减少这种争议。需要格外引起注意的是,学生学术刊物目前正处于一个转折期,它面临着从不为人知到走向学术前台的角色转变,如果准备不足,必然会使得学界丧失对其可能的信任和期待,当下的蓬勃发展也将预示着最后的衰亡。学生学术刊物唯有清醒地认识形势,不断调整,最终才能在学术界占有一席之地,并力争成为代表学生学术态度的学术经典。

•••••小幽默•••••

借宿

一位杂货商、一位银行家和一个政客在林子里迷了路。终于他们找到了一家农户,要求借宿过夜。农民说:“可以。但是我只有两个人的地方,另外一个人只能睡到牲口棚里,那里气味不好。”

“我睡牲口棚。”银行家自告奋勇。

半个小时后,有人敲门,门口站着银行家,他喘息着说:“抱歉,只是我真的快要被熏死了。”

“好吧,”杂货商说,“我去牲口棚睡。”

过了一会儿,又是一阵敲门声。“真的对不起,我虽然能忍受腐烂食物发出的臭气,可你的牲口棚臭味更甚。”杂货商说。

政客说:“你们两个真娇气,我去。”

半个小时后又响起了敲门声。农民打开门,门口站着牲口棚里所有的牲畜。

[整理:宁鹏举、孙跃、王宝盆、赵妹婧]

沃尔兹追思会*

【编者按】著名国际关系理论家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N. Waltz)教授不幸于2013年5月13日去世,享年88岁。与沃尔兹拥有深厚渊源的南开大学国际关系系师生举办了追思会,国际关系系的诸多师生参与了此次追思会,作为对大师的缅怀和对后学的激励。本期《新视界》为读者呈现了追思会上的教师发言和部分同学对沃尔兹的感怀,另附罗伯特·阿特(Robert Art)和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的纪念文章一篇。



教师感怀

张睿壮(南开大学国际关系系教授,南开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沃尔兹在中国唯一的博士):

今天首先感谢大家聚集在这里,来祭奠我们的这位国关前辈沃尔兹。面对现在的情景,我是十分感慨的。十几年前,多数学生是不知道沃尔兹的,现在我们聚在一起给他做这个追思会,说明国关界这十几年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我说一下我回忆我老师的那篇文章,这篇是上海《东方早报》的记者给我半天的时间所写成的。我一开始谈到对他的感受,我觉得我不是特别难受或特别震撼。原因主要有两条:一个是他已经达到人生的巅峰了,没什么好遗憾的;另外一方面是他走得比较痛快。

他起初得了肺炎,出院后又复发了,第二次住进医院是因为并发的全身性的心脏衰竭,这是 he 去世的直接原因。在那么长的时间中他一直在挣扎,所以我说摆脱痛苦,走得干脆利落也是一件比较好的事。对比一下长期在病床上挣扎的患者,我觉得他得到了解脱。



我有幸能作为沃尔兹的学生学习,当然这不只是运气,这里也有我努力的因素。我当时读博士,在第一年修国际关系理论课的时候,我第一次接触到了沃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然后我就觉得我被他的书强烈的吸引了,我知道这就是我想要的。大家知道他的理论非常简约,结构非常清楚,不像别的理论说起来十分复杂,你搞不清他到底要说什

* 本次追思会由曹滢、刘芮宁、刘志、张晓康、李家胜等作为学生代表发言,王芳琳主持。

么。尤其在比较政治领域，理论特别多，有数百种、数千种理论，而且有的理论有几十个自变量。当一个理论太过复杂时，就很难留给读者太多印象。而沃尔兹的理论非常简约，你一看就知道它解释什么，不解释什么。

因此，它的适用范围是有限的，这是它主要的漏洞。但社会科学本身就规定了没有那么多可以用规律预测的东西。如果我们能找到预测社会的规律，那么我们现在的社会恐怕都不是这个样子，因为那样的话我们可以掌握更多的规律，可以运用更多的规律来掌握我们的环境，但这样的规律还没有。社会科学中最接近科学的是经济科学。它能预测什么呢？如果你炒股的话，你就要运用这门科学。所有的科学家都是在大变革大改变后的第二天跑到电视上来说，这是什么道理，但从来没有能正确预测过，所以这就说明社会科学的局限。

沃尔兹找到了一点，在国际关系学科中建构起了一个接近科学的理论，能预测一定的东西。这是我们在社会科学中尽可能达到的最大成就。沃尔兹本人也在不断重复这种辩护，他说你们好多人批判我说你的理论这个解释不了，那个解释不了，你这个没有预测到，那个没有预测到，但我不是干这个的。而且现在还有人不断阐述这种批评，这完全是不着边际的批评。我最近还在网上看见一篇文章说，结构现实主义在解释国内政治时是失败的。沃尔兹明确说明了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区别，但现在还有舆论说既然解释不了我为什么要学你的。专家也会犯很多错误，你对这些人还有什么好说的。所以有好多人说，你们国关的理论没有什么，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以后都不搞国关了，或者说你们国关没有什么东西。但是实际情况是在别的领域也没有比国关好到哪里去。好多人都转到比较政治，比较政治领域说法万家，各有各的说法，只是师从一家，然后各持说法而已。而国关则没有这种分隔。

当时我还是学生的时候，我学了他的理论，我很明确我要跟这个人学。这也是要付出一定代价的。去的过程也并不那么容易，那是我用一年的时间把所差的学分通通补上了，这是所有学政治学学生的待遇，这是那些美国的名校，像哈佛这些学校都是这么干的。我之前所在的奥斯汀德州大学在美国政治学系排名第18，大家知道排名第18已经非常不容易了，而且他们的政治学系是按哈佛的课程来设计的，他们也想把学校打造成南方哈佛。他们的系主任找我谈话，他们跟我说：我们很遗憾你要走了。我在读之前已经工作好多年了，并不像那些直接从学校毕业的学生，或许不应该用评价别的青年学生的标准来评价我这样的学生。他们说如果我愿意留下来，可以让我继续写论文。系主任是拿这个条件让我留下来，但我拒绝了。我谢谢他们的好意，但没接受。如果我留下来了除了第一年外还要再加三四年，等于我总共还要五年的时间。

然后我还申请了一些其他的学校，另有一位老师打电话给我。美国的名校为了生源会花费非常大的精力，对于那些好学生，他们会打好久的电话。你来，我们会给你补助。我说我来找工作，他竟然答应还包我工作，但我最后还是决定去伯克利。

话说回来，我们今天在这里纪念沃尔兹，是希望给年轻的国关学人一个激励，让大家考虑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美国能出这样的学者、大师，我们还没有？老一代的学者做了一些

基础给你们铺路,希望你们中也能出世界级的重量级的学者。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有信心,很多老师可能也有同感,即现在的学生缺乏远大的理想,上学首先想到的不是追求学问,拿一个学位首先是为了学位的功用,不是说这个不好,但我希望你们当中至少有人能够把目标定得高一点,超越这一点,在绝大多数人所追求的改善自身环境和家庭待遇之上,能够有一少部分人有更高的追求,想成为像沃尔兹那样的人。

吴志成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院长, 国际关系系教授):

从现场我们能够感到大家对沃尔兹特殊的感怀和敬意。沃尔兹因为对结构现实主义这个学派的卓越贡献,而在国际关系学界无国不知、无人不敬。他必将成为整个世界社会科学的思想大家。他的去世是国际关系学界的损失。失去了一位学



者、一位大师,这不仅仅是美国学界的损失,我认为至少是当代世界社会科学界的一大损失。由于张(睿壮)老师的邀请,沃尔兹走进南开大学,还成为了南开大学荣誉教授,这是南开大学的荣幸。我们曾经能够面对面地了解和感受沃尔兹,否则就仅能停留在对他的知识和思想的学习层面。

沃尔兹教授是南开的教授,很多同学有幸聆听了他的讲座,我们除了继续学习他的思想知识,传承他的精神智慧,弘扬他的方法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南开国关在中国目前的学术背景之下,要做出自己的特色和理论,还任重而道远。现在来看,我们要通过自身的努力,做得更有特色,在中国国关学界做到前列,再进一步走向国际,进一步扩大影响。年轻的后学身为南开人,要时时牢记这样一份使命和责任。从沃尔兹教授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思想和精神的力量远远胜过物质,南开特色在于对沃尔兹的现实主义理论的真传,如果我们今后能够以此把国关做得根深叶茂,我们今天的目的就达到了。

韩召颖 (南开大学国际关系系主任, 教授):

首先,感谢同学们来纪念沃尔兹,我个人谈一些对沃尔兹去世的想法。我在最近这十多年时间对美国有比较多的接触,对沃尔兹的去世感到惋惜。他是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过程中的一位不可超越的人物。我真正对他有比较亲切的了解是在1999年,当时我细细研读(他的作品),对他的理论着迷。作为学者来讲,我对他的崇敬感是非常高的。为他做翻译,是对我莫大的荣誉。沃尔兹在我们南开国关人心中有很深的印记,这种印记与张老师也有着很深的关系。现在这种学术研究发展,尤其中国、中国国际关系学科,与过去相比有很大进步,

这是肯定的,但是我们得认识到我们的不足,现在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要踏踏实实地做学问;要有志向,科学的基础是要求真、求知。什么是知识,不是写了几篇文章就是知识,沃



尔兹对我们做了很好诠释,是理论体系。结识沃尔兹以后,他成了我这一辈子都无法超越的榜样,我没有他的那种才华,也可能缺乏他的那种勤奋,但我愿做他山下的仰望者。做学问还要踏实,对知识和真理的追求,要有这种精神。南开出去跟别的学校交往,大家不能

不提南开与沃尔兹的渊源和对沃尔兹的传承。我们希望对于未来南开的这些同学们,这种精神,即对知识、真理的追求,是我们永远要去继承和发展的,希望同学们不断地去攀登,去登上山的顶峰。

学生敬怀

一、大师生平

著名国际关系学者肯尼思·沃尔兹于2013年5月13日在美国逝世,享年88岁。在此,我们对这位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创始人、国际关系理论巨擘、“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国际关系理论家之一”——肯尼思沃尔兹教授,表示沉痛哀悼。

沃尔兹出生于美国密歇根州安娜堡市。他的父母受教育程度并不高,但他天资聪颖,年少时便就读于当地的菁英学校安娜堡高中。高中毕业后,沃尔兹到欧柏林学院主修数学,但在毕业前改攻经济学。可由于后来发现自己对经济学的兴趣不大,最终,沃尔兹定下心来攻读政治学,并于1954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现在看来,他没有选择继续攻读数学和经济,至少对国关学界而言是一件幸事——由此我们拥有一位具有开创性地位的理论大师。

沃尔兹先后执教于斯沃斯莫尔学院、布兰代斯大学、伯克利加州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并于1994年成为伯克利加州大学政治学系终身荣誉教授。

沃尔兹教授曾担任美国对外政策委员会委员、美国政治学会会长、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等职,并担任《美国政治科学评论》、《世界政治》、《国际安全》等学术刊物的编委。



他所著的《国际政治理论》自1979年出版以来,便被誉为“当代经典”,是迄今为止国际关系学界影响最大、引用率最高的著作。

鉴于对国际关系研究做出的卓越贡献,沃尔兹教授于1999年荣获美国政治学会颁发的“詹姆斯·麦迪逊政治科学杰出学术贡献奖”,并被委员会评价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国际关系理论家之一”。2010年获国际安全研究类别的杰出学者奖。2005年,一份针对美国国际学者的调查称,过去20年间,沃尔兹是对国际关系学科最具影响力的两位学者之一。(正义:)在学术上,沃尔兹教授是一位现实主义大师。正如张睿壮教授所言,他身体力行了“明智的利益”和“审慎的权力”两条原则。沃尔兹爱国,但反对武力的滥用。出于对美国国家利益的考虑,沃尔兹对越战和伊拉克战争均持反对态度。越战期间,沃尔兹就是反战运动的舆论领袖之一;伊拉克战争前夕,沃尔兹和几十位重量级学者和社会知名人士在《纽约时报》刊登整版广告,反对这场战争。

沃尔兹教授和中国也有着不解之缘。90年代大师第一次来到中国,在北京大学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讲学。2004年他受邀来到南开园,受到南开人的热烈欢迎。遗憾的是,这一次也是沃尔兹对中国的最后一次访问。

沃尔兹也是一位优秀的教师。他教导学生“学术是没有捷径的,草率工作是不行的,应该以严谨的态度去对待”。同时他很重视写作,在他看来,一个学者的首要职责是让读者明白你在讲什么。因此,他的学生都继承了他大道至简的写作风格。

大师的一生充满了传奇,不仅仅在学术造诣上值得我们尊敬,同时在严谨的教学态度以及做人的修养上也值得我们学习和继承。

二、桃李天下

肯尼思·沃尔兹是当代首屈一指的国际关系理论大师,同时他也是一位备受学生敬仰与爱戴的教授,曾先后任教于伯克利加州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在他几十载的执教生涯中,传道授业,门下高徒多在世界各知名学府或研究机构担当重任,许多我们熟知的国关大腕儿都曾受教于沃尔兹教授,可谓是为国际关系学界培育了诸多领军人物。

沃尔兹教授辞世之后,张睿壮教授、斯蒂芬·沃特教授等纷纷发文悼念,从他们的文字里,我们可以感受到学生们对这位学术和精神导师的深切追思,也可以一睹沃尔兹作为一名教授的师者风范。

沃尔兹本人对真知的追求与坚持极为严苛,对学生亦是严要求高标准,对他们学术上的不足从来都是直言不讳,不留任何情面。这样的严苛要求学生付出更多的努力,历经更多的艰辛,但是却也造就了学生们



的杰出与卓越,从而成为他们对沃尔兹教授最为感恩的部分。

在学生们眼中,沃尔兹教授亦是一位具有学术宽容的大家。这种宽容,表现在与论战对手(当时也在伯克利任教的自由主义阵营的厄恩斯特·哈斯)相遇时绅士般的招呼致意;表现在对学生不同甚至是对立观点的包容与支持上;表现在对批判美国霸权主义行径观点的开放上。在沃尔兹教授身上,治学之严谨与大家之风度如此和谐地相融,使得这位智者更具学术魅力,令人由衷敬仰。

大道至简,沃尔兹教授从来不将高深的国关理论塑造成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而是致力于用理论去阐明现实问题;他鼓励学生宏观思考,勇于挑战根深蒂固的正统理论;也特别注重对学生写作能力的培养,倡导明了易懂的写作风格。沃特教授回忆说,当时沃尔兹教授要求学生阅读两本写作书,一本是福勒的《现代英语用法》,另一本是斯特伦克和怀特的《风格的要素》,并且经常在授课过程中穿插讲授写作知识,因此,尽管学生们所持的理论观点以及采用的研究方法不尽相同,但他们都在沃尔兹教授的教导下,领悟了写作的真谛,成长为善于写作的学者。

作为国关专业的年轻学子,我们或许会遗憾不曾也不再有机会能够聆听沃尔兹教授的教诲,但是我们相信,思想是不朽的,我们可以在沃尔兹教授的著作中与他攀谈,汲取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也相信,师道是永续的,沃尔兹教授的理念与追求会由他培育出的国关精英们传承下去,从而影响一代又一代国关学子。

斯人已逝,吾辈定当承其遗志,奋然前行!

三、学术造诣

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沃尔兹享有“思想之王”的称谓。一方面他继承了早期现实主义的思想精华;另一方面,他又创立了高度简约的结构现实主义,从而开创了国际关系学界研究的新局面。

作为国际关系学界的一代大师,沃尔兹的著作不多,但部部都是经典。仅仅《人、国家与战争》《国际政治理论》两本书便已极大地改变了国际关系学界的面貌。《人、国家与战争》出版于1959年,是由沃尔兹的博士毕业论文改编。书中运用层次分析法寻找战争的原因,时至今日,层次分析法仍是国际关系研究中最重要路径之一。

沃尔兹在1979年出版了《国际政治理论》一书。在这划时代的著作中,他正式创立了结构现实主义这一理论流派。结构现实主义有自己的研究问题、概念、逻辑和推论,这就从本质上超越了对国际政治现象做描述性的“概论”,将这一学科的研究水平带入了更高的理论层次。该书是当今国际政治研究领域影响最大,被征引频率最高的著作。自问世以来的三十多年中,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经历了许多的论战与变革,新的理论流派层出不穷,但无论是自由制度主义还是建构主义,讨论的许多问题都无法绕开《国际政治理论》一书。结构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间的论争构成了国际关系学界“第三次大辩论”的主要线索,这极大地促进了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

专著之外, 沃尔兹的论文也因为思想深刻, 见解独特而掷地有声。1990 年发表的《现实主义思想与新现实主义理论》一文梳理经典现实主义与结构现实主义的差别。1993 年发表的《正在浮现的国际政治结构》和 2000 年发表的《冷战后的结构现实主义》两篇文章中, 沃尔兹分析了单极结构给国家行为和结果带来怎样的变化这一问题。在 1983 年、1990 年和 1995 年多篇关于核武器及其给国际政治带来的影响的文章中, 沃尔兹认为核武器在主权国家间的扩散反而会阻止爆发战争。这些文章不仅极大地影响了人们对当代国际政治的惯常看法, 而且也给我们极大的启迪, 那就是要看到常识背后的东西。

总之, 沃尔兹这位“思想之王”对国际关系学科发展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他更为明确地界定了国际政治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 他创立了国际关系学科第一个完整的社会科学理论样板——结构现实主义; 他的理论研究逻辑简明优美, 概念无可挑剔; 他对现实的思考与众不同。

基欧汉曾说, 沃尔兹是那代人中最优秀的国际政治理论家, 他以优雅和精确的论述促使我们重新考虑传统观点, 激起沉思、反驳、争辩和重构。米尔斯海默曾说, 沃尔兹是过去半个世纪里最重要的国际关系理论家。沃尔特赞赏沃尔兹是二战后最卓越的国际关系理论家, 因为他视野清晰, 分析有力, 文笔漂亮, 展现了他作为知识分子的勇气及其特有的睿智。

自从诞生以来, 结构现实主义便遭到了一些批评和挑战, 但是结构现实主义仍然牢牢占据国际关系学界的理论制高点。

岁月匆匆,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无数的赞赏和批评沃尔兹现在已经听不到了, 但是他留给国际关系学界的却是永恒的财富, 他本人也成为我们仰视、感恩的一座丰碑。

四、结缘南开

2004 年, 也是在 5 月, 应国际问题研究院的邀请, 沃尔兹教授于 5 月 4 日抵达南开大学



作为为期两周的讲学, 并在 10 日讲授了他的第一堂课, 5 月 15 日, 他受聘为我校名誉教授, 并在伯苓楼为师生作题为“冷战后国际关系与美国外交政策”的精彩报告。那是南开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主办的“国际关系理论名人系列讲座”的第一讲, “国际关系理论名人系列讲座”项目计划在三年左右的时间里邀请

一批在国际学术界具有深远影响的著名学者先后在南开大学开设国际关系理论的讲座课程。名列大师讲座第一名, 沃尔兹教授当之无愧。

沃尔兹教授的讲学分为讲授班和研讨班两部分, 讲授班(第一周)主要面向本科生和研

究生,于10日在范孙楼模拟法庭讲授了他的第一堂课。研讨班(第二周)则移师116,主要面向研究生和教师。除本校国际关系及其相关专业的师生参加外,来自全国各地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几十名师生也报名参加沃尔兹教授的课程,可谓盛况空前。

除开设国际关系理论课程外,作为南开百年校庆的活动的一部分,南开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揭牌暨肯尼思·沃尔兹名誉教授致聘仪式于5月15日在伯苓楼举行。侯自新校长出席仪式并讲话,法政学院、国际问题研究院、社科处、国际学术交流处、人事处、研究生院等部门负责人及数百名师生参加仪式。

肯尼思·沃尔兹在致辞中感谢南开大学授予他“名誉教授”的崇高荣誉并对国际问题研究院的正式成立表示祝贺。他说,非常高兴来到充满传奇色彩的中国南开大学讲学并受聘为名誉教授。

大师在南开的时光是短暂的,但是影响是深远的。九年后的今天,所有当时的亲历者都仍对那段时光记忆犹新,大师的音容笑貌犹在眼前。所有的国际关系师生,都会永远感怀他。

五、追忆

2013年5月13日,著名的国际关系学理论大师,肯尼思·沃尔兹先生溘然长逝。沃尔兹先生在国际关系学界的主要成果,大家都已经耳熟能详;其在国际关系学界、乃至政治学界的重要影响也深远持久。

我想,任何一个国关人,在初学国际关系时,都会对沃尔兹先生的作品留下深刻的印象。2010年,我是一名普通的国际政治专业的本科生,当时,我们学习国际关系理论。在课堂上,老师就向我们隆重介绍了沃尔兹其人与其最经典的作品《国际政治理论》。古人讲,知人而论世,其文如其人。非常遗憾,我并未见过沃尔兹先生,不能向他请教国际关系的复杂现实与绝妙理论。但是,通过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历程以及国际关系理论的已有成果,我可以深深地理解,沃尔兹先生所创建的结构现实主义在理论界的伟大意义;通过阅读沃尔兹先生的主要作品,我同样可以深深地感触到沃尔兹先生思维的缜密、逻辑的严谨、理论的唯美。

何为美?美不是牵强附会,不是冗繁复杂,不是雕琢玉饰。朱光潜说过,毫厘之差,微妙所在;风行水上,自然成纹。这才是美,美是精确,是简约,是自然。

我想,任何一个国关人,在稍微深入地研究国际关系之后,都会为沃尔兹先生创建的结构现实主义所折服。也许,初入此行,你会枉



然发现你对国际关系的言论与说法并不能说服那些常常读书看报的街头巷议者;你会枉然发现你对国际关系的见解与评论也不敌偶尔一次乘坐出租车时那位热心的司机;你更会枉然发

现你对国际关系的分析与思考的水平还远逊于专业报刊的评论员。但是,当你深入地学习与研究国际关系之后,你才猛然发现,国际关系并不同于其他学科,它是一门非常讲究逻辑、推理、解释与诠释的学科,它可以真正称得上科学。而这一切,都得益于沃尔兹先生。正是先生的结构现实主义,廓清了前人的谬误、构建了精美的逻辑,创建了对国际关系的科学解释。曾有人说,人文社科都见仁见智。我想说,国际关系很复杂,因此,每个人都能发表看法;国际关系很简单,却不见得每个人都能明白其简单之处。这种简单,只有伟大的理论家才能举重若轻,在三言两语间见真谛,在行文流水中显精要!

我想,任何一个国关人,在深入研究国际关系十几年、几十年之后,当他已经成为知名的国际关系学者,就必定会感慨沃尔兹先生在国际关系学界产生的重要影响。的确,你可以认同他的观点,也可以反驳他的观点,但是你一定绕不开他的观点。有些人,如在夜空中划过的流星,一闪而过;而有些人,却如那些在悄然的黑夜落下的陨石,在思想的大地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沃尔兹先生,就是这样的一位国际关系的思想大师!如果说,亚当斯密发现了使一国富裕的秘密,那么沃尔兹先生则发现了复杂国际关系的层次、结构与规律。与地球本身相比,甚至与生命本身相比,人类存在的历史如此短暂,人类文明的历史则更加短暂。可是,在这短暂的历史中,我们改变了地球,我们创造了伟大的文明也深深悲痛于互相厮杀的冲突与战争中。世界历史的起伏如同一道道山脉,勾勒出历史发展的轮廓,而沃尔兹先生就如同绘画的大师,把这起伏的山脉挥洒于精妙绝伦的文论之中,于是,我们再也不必“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我想,任何一个国关人,在其穷尽一生的研究中,会毫不惊讶的发现,任何伟大的道理都归于对规律的探索,任何复杂的事物只不过是简单的规律在相互作用。古代著名的思想家老子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那些故弄玄虚,将复杂事物更加复杂化的人,终究不能构建出简约的理论;那些耸人听闻,将客观规律置于左右而不顾的人,终究不能扶摇而起、直上九天。越是不学无术的人才喜欢滔滔不绝以掩饰他的无知,越是心中乏味的人才喜欢口若悬河以掩饰他的心虚。而那些真正有才识的人,他们惜墨如金,爱字如玉,总是窥见复杂事物背后的动因与规律,把最简约的理论告白于天下!沃尔兹先生,就是这样一位令人尊敬的学者。在武学界,我们听过很多武林高手,他们都身怀绝技;可是,我们也听过,武学的最高境界是止戈,是无招胜有招。在兵法界,我们也听过各种阵法,可是兵法的最高境界是无形,于无形中制敌;是上兵伐谋。沃尔兹先生正是这样一位境界高远的人。

我想,任何一个国关人,当得知沃尔兹先生与世长辞的时候,都会心生惋惜。甚至,并非国关界的人,也会明白个中滋味。我有一位英语专业的朋友,曾经向我借阅《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英文版)一书,他于我处得知沃尔兹先生去世之时,长叹,惋惜、惋惜。

呜呼,先生驾鹤而去,仙游四海;我辈定当奋进,墨染乾坤。望沉舟而知风浪,千帆再发;见良木而识荫蔽,万木逢春。前有古人,拷问历史脉搏;后有新秀,探索寰宇风云。访古今而知兴替,遍中外而明纵横。先生已然逝去,我辈应哀思之、崇敬之、践行之、奋进之。

追忆先生，心中所动，情之所至；所感所想甚多，已不知所言。纵有千言也不及先生之万一，只能以此感怀，崇敬之情，溢于言表。

Kenneth Waltz and His Legacy^{*}

The Man and The State of War

Robert Art and Robert Jervis^{**}

Close to midnight on May 12, at the age of almost 89, Kenneth Waltz passed away. He was lucid until a just a few hours before the end -- mentally sharp and clear-eyed as ever, fully engaged intellectually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he always insisted on calling the field that, as opposed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orried about what he saw as America’s overextension, and insisting, as always, on the need to be wary about the use of U.S. military power.

Ken was the leading realist theorist of his generation, and arguably the leading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heorist of the last half century. His first publication, *Man, the State, and War*, came out in 1959 and remains in print today; the last thing he wrote, “Why Iran Should Get the Bomb,” appeared in *Foreign Affairs* in 2012. His teaching career spanned over fifty years and many institutions -- first Columbia, then Swarthmore and Brandeis, finally Berkeley, and then back to Columbia as an emeritus. In his scholarship, he asked the tough questions about the difficult and important issues. He was motivated by both theoretical and policy questions, the latter often setting the agenda for the former. He was intellectually courageous, usually staking out iconoclastic positions -- some of which were initially derided, many of which ended up becoming mainstream thinking. No matter what one’s theoretical persuasion, Ken Waltz was an intellectual force that had to be reckoned with.

He cared about writing style, and came down hard on his students, asking, “Who will bother to read you if you cannot make clear what you are thinking?” He would mark up one dissertation chapter and then write on it: “This is how it is done; do it right the next time.” His advice to many of his doctoral students became legend: “This thesis has problems and only you know how to fix them.” He believed that his task was to point out the problems; yours, to deal with them. Spoon feeding was not in Ken’s teaching vocabulary. Ken taught that the world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was one of “self help”; if he was your thesis advisor that is the world you lived in.

Talking intellectual shop with Ken could be a forbidding experience. He was straightforward and direct, and had an uncanny instinct for the significant -- unlike so much scholarship today that

* 本文是于 2013 年 5 月 22 日发表在《外交》上的一篇纪念文章。地址参见 <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139400/robert-art-and-robert-jervis/kenneth-waltz-and-his-legacy>。

** Robert Art is *Christian A. Herter Professor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t Brandeis University and Fellow at MIT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Robert Jervis is *Adlai E. Stevenson Professor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t Columbia University and a member of the Saltzman Institute of War and Peace Studies*.

seems to have an uncanny instinct for the insignificant. He could poke holes in most arguments with ease, had no patience for fluff and bombast, and yet was always kind, courteous, and constructive -- even as he shredded your work. He cared about brains and substance, not age and formal position or rank. He treated younger scholars he respected as his equal, not his subordinates.

Up to the very end of his life, he was a realist in the best sense of the term: he saw the world without blinders, but wanted, and acted through his writings and teaching, to make it a better and safer place by aiming for what was feasible, when feasible meant the second-best solution. He lived, wrote, and taught according to Aristotle's dictum: the essence of political tragedy is to reject the good for the perfect. Ken aimed for the good because he knew the perfect was not in the cards.

He was a man with catholic interests and training. He read widely in literature, loved opera, majored in economics in college, and developed a keen interest in political theory during his political science doctoral work at Columbia. He came to international politics late in his graduate training, and became driven by the quest to provide some order to what was then a young and fairly chaotic field of study in the United States.

Ken wrote slowly and published less than any of the other leaders in the field. This was not because he had less to say, but because he worked with great care. As Tom Schelling said, "it takes him a long time to write because everything he does is read for a long time." The way he wrote and the way he thought were related. His prose was tight and concise; there were relatively few words because each one counted. This is the way he approached theory, which he felt would be defeated if it tried to capture everything. The objective was to pare things down, to get at their essences, and to be willing to leave aside (or as he put it, "abstract from") a great deal.

He was influenced in this approach by his early work in political theory and economics. The former taught him to concentrate on the matters of deepest and lasting significance. The latter reinforced this perspective and produced a taste for informal models that were deductive and rigorous. Thus although he never wrote down equations, both Bob Powell and Jim Fearon were his students and found his approach to theorizing exciting, enlightening, and congenial. Ken also liked economics because it kept one focused on incentives. This perspective put him at odds with most of IR research when he was starting his career in the 1950s, and led to the systemic argument he started in *Man, the State, and War* and developed in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t also underpinned his controversial views on proliferation. Individuals and states certainly differed, he believed, but in a setting that lacks the ability to make and enforce binding rules, the desire to survive produces enduring patterns, most obviously balance of power dynamics and war. While some leaders and some types of states may be somewhat more war-prone than others, the starting

point for analysis must be the incentives that the environment sets for them (an environment that their behavior, in turn, helps shape).

Man, the State, and War gave the field these three “images” (or “levels of analysis,” as they became known later) and pointed to the weaknesses in the arguments for the causal role of human nature and regime type. But it did not explore why some systems were more likely to go to war than others. This was left for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efore he wrote it, most scholars had argued that bipolarity was less stable than multipolarity, and did so by pointing to the dangerous dynamics that characterized European politics before World War I. Ken’s breakthrough was to show that this system had actually been multipolar, and that its apparent bipolarity was the result of looking superficially at the alignments between the two camps rather than at distribution of power among five or six independent roughly equal states within them. The configuration after World War II, by contrast, was truly bipolar, and under this structure the superpowers could neither be dragged into war by their smaller allies, nor shirk their responsibilities in the hope that others would pick up the burden.

Ken’s focus on incentives and the primacy of security led him to believe that nuclear weapons made Soviet-American relations safer and that proliferation might similarly stabilize rivalries in other parts of the globe. Nuclear weapons were good for threatening retaliation but not much more, and so could freeze the status quo and bring peace. He certainly believed this argument, but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he also enjoyed the fact that few others did. He was, after all, a contrarian.

This trait was clear in foreign policy and democratic politics, his second and least-known book, which argued that contrary to what was believed on both sides of the Atlantic when he published it in 1967,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ystem was better designed to produce effective foreign policy than the British one. If this conclusion was somewhat self-congratulatory for the US, the same cannot be said for the rest of his work. It shows the falsity of the common claim that realism expects countries to be bellicose and acts like cheerleaders in urging them on. To the contrary, although Ken denied that his theory could explain states’ foreign policies, he argued that it indicated that during the Cold War and after, security did not require the US to fight distant wars, and he was a forthright opponent of the adventures in Vietnam and Iraq.

His family, friends, colleagues, and students mourn the passing of the man. Generations to come will continue to wrestle with his work.

[整理: 马焱粮、彭紫嫣]

[责任编辑: 刘芮宁]

2013 届毕业生特辑

美丽的南开，我的家

“美丽的南开我的家！

美丽的南开我的家，我用青春伴随她。

大中路旁杨柳翠，新开碧波映晚霞。

古钟悠悠铭校史，主楼巍巍塑英华。

美丽的南开我的家，我用一生去爱她。

敬业广场书声朗，马蹄湖水映荷花。

公能校训记心上，月异日新竞芳华。

今日湖畔放声唱，明朝建功在天涯……”



【经验分享】

【编者按】每一届毕业生都会留下自身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中的经验感悟，这将会成为后来人的宝贵财富。本期毕业特辑中，2013 届毕业生中的几位优秀代表，将向大家介绍自己在保研和实习方面的经验，并与大家分享在校生活的感悟。

关于对外保研的一些感想

权贤美*

这说不上是经验交流，就算是我外保的一些感想，希望对在这方面有迷惑的同学们有所帮助和启发。

我觉得大三下半学期是最纠结的时候，因为能够做的已经不多了，我没有参加任何夏令营，我非常反对“一把抓”行为，即心中没有想法看到什么就参加，能拿就拿，先保底再说，这样会使得自己更迷茫，而且心不向往之却投身于此是非常浪费时间的行为。我没有参加夏令营是因为，想参加的清华夏令营要求非常严格，一般只要第一名而且进入最后一关拿 OFFER 的人数也是寥寥无几，而其他的我不想参加，因此不想浪费时间也不想因为我使得其他想参加而名次在我后面的同学因为名额有限而被挤掉。保研时期是很敏感的时候，在不伤害同学的基础上追求自己想要的是最好的，也应该这么做。同时夏令营只是一个拿预 OFFER 的过程，更多保外的同学实际上走的是 9 月份的推免过程，失败了也不要紧，机会还是很多的。

在保外和保内的选择上，我更多考虑的是想要换一个新的环境，因为我自身的原因，家人里有学法律的，高中的时候就想学法律，因此想要保外读法律，无论做什么，兴趣都是最重要的，所以选择一定要遵从内心意愿。另外保内是非常不错的选择，熟悉的老师和环境会让你更加游刃有余，南开已经非常好了，千万不要“自视甚低”，唯一的缺点可能会是在读研时期，走在校园内感受着熟悉的风景，但是本科同学却不在身边的感伤吧！

清华法律硕士的申请在初步筛选复试名单的过程会很严格，据说 2012 年得到希望推免的申请超过 2000 个，最终是只要了 120 个人复试，入选比例是 6%，应该还是比较恐怖的，我见到的一般是专业前两名而且绝大多数是名校，名次在 3 名之后的一般就没有机会了。

清华的复试分为笔试和面试两个部分，因为申请法硕的都是本科非法学的，因此复试中不会涉及法律专业知识但非常注重综合素质。笔试是论文写作，给了一句话，要求根据自身的理解写出论文，去年是关于社会科学中的实证方法应用的问题的，每年不一样，没有办法准备，发挥正常水平应该就没问题的；面试是分组面，我被分在第三组，每组 30 个人，一个一个进去，面试的是法学院的 6 位老师外加一位做记录的老师，问的是有关国际机制方面的问题，我想这和我国际政治专业背景有关，老师很和蔼亲切，在回答的过程不要过分紧张。

* 权贤美，女，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 2013 届本科毕业生。

张,“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把自己所理解的表达就可以了,不要试图欺骗和胡说,这样非常不好。

总而言之,清华法硕复试没有办法准备,但我觉得只要发挥出正常水平应该就没有问题。我只参加了这一个复试,对其他学校和专业的没有经验,据说人大和北大的法硕复试会涉及到法律专业知识,如果有读法硕的想法,准备准备也很好。

保研很敏感,在追逐自己所想的同时不要损害到其他同学的利益,尤其是名次靠前的同学,因为名次稍微靠后的同学一定意义上是要视前面同学的选择而做出自己的选择的,彼此间的沟通交流是很重要的。

最后,希望学弟学妹能够明确自己所想,实现目标。

求职经验分享

祝华忠*

一、自我介绍

祝华忠,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政治 09 级本科生,第二专业国际经济与贸易。班级排名前三,获得国家奖学金、南开大学奖学金等奖励。

职务:院外联部部长、弘扬科学学社社长、爱心俱乐部副主席等职位。

获得的 offer: 银行类:中国银行、招商银行、光大银行、浦发银行;外贸类:建发集团;零售行业:苏宁电器(总裁办)、海信北京;会计事务所:普华永道会计事务所北京所;地产类:思源地产;进入终面后放弃的企业:中国证券登记深圳分所、厦门国贸、衣恋管培生。

二、大学阶段规划

生活之美在于未来的不可知性,我们可以借由自己的双手来推动自己行动轨迹的改变。但不可知性并不意味着漫无目的,合理的规划会让你在面对困境时能回到自己出发的那一原点,更加自信并无所畏惧。

大学生活可以“两眼不观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也可以忙于学生工作丰富人生经历,当然也可以刀塔在手,恋爱走你。大学生活的多样性我们需要去体验,但是作为学生时代和社会的一个转折点,我们也需要去思考自己未来的路该怎么走——保研、考研、工作,抑或出国留学?

不管怎么样,工作是大家最终会面对的问题,大学时代中我们可以对自己的未来做一些规划。

第一阶段:大二上学期到大三上学期,关注期。

可以关注一些宣讲会 and 职场讲座,提前了解招聘会的形式,甚至可以通过实习的形式来

* 祝华忠,男,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 2013 届本科毕业生。

深入了解企业的运营, 帮助自己对“求职”建立一个更全面的了解。

第二阶段: 大三下学期, 思考期。

自己是否适合读研? 大学毕业就立刻参加工作会否对自己的人生有帮助? 在这一学期你应该要对自己大学生活有一个较明确的选择, 切不可过于犹豫。

第三阶段: 大三下学期的暑假, 预演期。

如果选择毕业就工作, 这个暑假的实习就是一次实战, 因为在实习前会涉及到实习的面试等问题, 你可以将这些经历当作你即将面临的求职季的一次练兵。此外, 这一次正式的“好”实习会有利于你简历的编制。

在这个暑假, 你需要对你求职季的简历、正装等进行准备, 你还可以通过应届求职网(主要关注, 强烈推荐)、大街网和中华英才网等关注今年的招聘进程, 跟进你希望加入企业的招聘流程。

第四阶段: 大三下学期, 实战期。

求职季的冬招时间为九月中旬到农历新年, 这个也是企业在应届生招聘中招聘人数最多的时期, 争取在冬季招聘中有一个保底的 offer。

春招基本为来年开学到 5 月份, 招聘的单位会明显减少, 多数为企业补招。

三、实习篇

获得实习的渠道:

1. 前辈推荐, 前辈推荐最靠谱, 前辈不限于学长学姐, 更包括你认识的校友或亲友, 推荐形式的实习获得的效果最明显。

2. 实习招聘

一些单位会在应届生求职网等网站或者自己官网贴出关于招聘实习生的通知(有假期实习, 也有平时的实习), 同学们可以及时关注, 但是前提是你的简历等已经准备充分。这样的应聘实习最为正式, 也对你的帮助最大。

最关键的是通过这样的实习你很有可能获得该企业的最终 offer 的机会, 或者是在面试的过程中免一试的机会。

推荐企业: 腾讯、四大会计事务所、快消行业(雀巢、宝洁等)、银行、券商或投行。

3. 求职比赛或者商业案例类的比赛

有些校园此类比赛会给予优秀的选手实习的机会, 同学们可以在课余生活中多关注。

四、简历篇

简历是面试官对你的第二印象, 应该简洁大方, 格式正确, 对仗工整, 表述职业化、数据化。好的简历通常为一页, 不超过两页。中文简历必备, 英文简历也不可缺少。

1. 模版学习

开头为姓名, 联系电话和邮箱, 还有求职岗位。右侧有照片。

大的模块包括教育背景、实习经历、社团活动情况、社会实践以及其他类别(英语能力、计算机能力和爱好)

2.不能一份简历走天下

针对不同的简历你需要有不同的表述和编制

3.务实求真

简历尽量要真实,你可以有不同表述,但是在时间和数据方面最好诚实,因为求职过程中你会面对面试官一轮轮的挑战。

五、正装篇

男生:一套合体的正装、最好两件以上的衬衫,领带和衬衫的颜色款式最好大方得体,不可太休闲和随意。

女生:女生最正式的正装应该是上身西服下身职业过膝裙,但是穿裤子也属于正式着装。女生不需要打领结。淡妆是需要的,但切记太浓的妆。

头发清爽即可,不需要太个性。随身准备口香糖是可以的,但是在面试过程中不能嚼口香糖。有个职场化的背包或肩包(能放得下简历)最好。

六、求职篇

(一)投递简历

关注应届生网站和宣讲会,投递网上简历或现场简历。网上投递有时会有开放式问题,中英文都有可能,要耐心填写。现场投递简历有时会有面试,如果是在让同学代投的情况下要及时跟同学沟通现场情况。

切记不可过晚或者在截止日期投递简历,投递人数过多会导致不能接受你的简历(妮维雅经历)。

不可偷懒,投递成功建立在一定量投递简历数量。

(二)笔试

通常通过简历筛选,你会收到参加笔试的通知。

求职笔试可以提前准备,一些公司的笔试题目会跟往年雷同,在网上可以找到原题提前准备。

笔试通常和公务员考试类似,推荐华图或中公的公务员复习材料,内容很齐全。

笔试有的分机考和笔试,考试注意事项可参照自己多年考试经验。

(三)面试

面试包括一对一面、一对多(面试官)面、多对多面,具体的形式包括压力面,结构面(问题固定),半结构面(半开放式问)。

通常在第一轮面试中采用的案例分析的形式,多名应聘者针对一个案例分析,面试官观察应聘者在面试中的表现并打分。面试中通常角色扮演,领导者、计时者、隐形领导者、调

节员等。但是在讨论中主要注意的是不要过分拘泥于角色定位,同时顾全整个团队的目标也很关键。

在接下来的面试你会与认识主管,部门主管乃至总经理,面试过程中主要针对你的简历提出问题,也会结合上一场面试中面试官给你的评价提出问题。

面试中恰当的礼仪要熟知,迟到是最忌讳的(事先查好路线,准确记录面试开始时间和场地)。

面试结束可以向面试官所要名片,但不是必须也不能强要,可以在面试后写感谢信,但个人觉得只有到部门经理级别面试之后感谢信才会有作用。

(四) 面试注意事项

1.面试时自信很关键,但不能盲目自傲,要做到不卑不亢。

2.对简历的提及的时间事件要熟记,并且能将其中的一些事件通过案例或故事的形式展开。

3.面试前对该职位有一个了解,年报中的资产、销售额、利润要事先牢记,公司的企业文化和招聘人员特质要求要深入分析,在面试过程可以结合相关点来论述。

4.面试中讲话要有逻辑,大方得体,不可过于啰嗦,在面试官过于强势的前提下先跟着对方的节奏走补充自己想表达的,若是对方比较温和可以尝试掌握面试的节奏(通过话题转化等方式)

5.记录本记录面试经验和技巧,经常性及时总结,自己总结的经验才是自己的经验

6.英语能力要提高,尤其是口语能力

7.有所舍弃,面试有冲突要懂得舍弃

(五) 所谓“霸王笔”、“霸王面”

在求职的过程中需要不卑不亢,但是“玻璃心”也是要不得的。面对面试官的“挑衅”你需要暂时收起“天之骄子”的心态沉着冷静应对。

笔试或面试过程你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如果是因为你简历填写的原因不能进入笔试亦或者是因为在上一场面试中发挥失常导致不能进入下一次的面试,那么“霸王笔”、“霸王面”的事宜就可以提上你“求职议程”了。

准备工作一定要做足。笔试或面试的地点和时间等具体安排要事先打听清楚,在到达现场向工作人员说明情况,希望为自己争取进一步表现自己的机会(态度诚恳)。如果工作人员同意那么就等待下一步的安排,倘若被拒绝可以再争取下但是要掌握好分寸。

虽然说没有尝试就不知道结果,“玻璃心同样可以铁打”,但是鉴于有些企业明令禁止“霸王笔”、“霸王面”,还有求职过程中精力有限的原因,笔试和面试还是尽量按照安排流程来进行。

七、offer 比较和签约

主要考虑发展前景、喜爱程度、薪酬、户口问题、家庭因素、专业结合问题等因素。要与公司、学院(及时跟辅导员沟通)、学校保持信息的沟通。

拿什么致你的青春

汤明磊*

时光荏苒,刚进入大学校园时的情景历历在目,转眼已经辗转津杭,度过了六年时光。实事求是地说,我在大学的六年生活属于平平淡淡、一事无成的那一类。常常跟同学开玩笑说,大学向社会输出三类人,第一类叫人才,是社会的珍贵资源;第二类叫人力,是社会的潜在资源;第三类叫人口,就是像我这样的,只是在全国人口普查的时候才有意义。然而这又是我个人生涯中不平凡的六年,这期间历经了四个专业的坎坷,完成了太多角色的转换,面临过各种机会的抉择,个中的纠结、失落、领悟、感慨应该也不会比各位学弟学妹少,想借着新视界这个平台和师弟师妹们聊聊自己心里的想法,就当是走上博士这条“不归路”前的最后一次真情告白。

一、求职经验分享

由于是毕业生经验分享,所以我向大家汇报内容的第一部分是关于求职经验的,而我更在意的是第二部分,也就是个人对大学期间出现的一些困扰的肤浅理解。第一部分是关于求职的,我从去年 9 月开始投入求职大军,到去年 12 月确定被保博,当中三个月参加了几十场面试,也拿到了一些 offer,想从简历关、笔试关和面试关三方面介绍一下我收获到的小经验。

(一) 简历关

首先,你必须准备不止一种简历,以突出你简历中的不同模块,外企私企可能更注重实习经历,国企可能更注重学生工作,高校和科研院所可能更注重科研能力,随时在包中备份多张简历,向不同的用人单位发放不同的简历,这一点不要怕麻烦;其次,可以对包括头像在内的简历的一些内容做适当的优化,我找工作的时候也对自己进行了明显的瘦脸瘦身、智能磨皮加工。为了获得 HR 筛选简历时 0.01 秒的那种心电感应,对奖励荣誉、实习经历、学生工作、科研成果等都可以做适当优化,这无可厚非。大家都想找一个好工作,但必须要拿捏好度,不要把突破优化蜕变为造假。把优化部分的功课做足,比如一项实习的时间可以不到两个月,但要确保你至少参加过,这样 HR 问你的时候你至少可以做到胸有成竹、面不露怯;再次,对申请的那个公司要做一定的了解,比如关注一下公司架构、运行机制甚至是它近几年的报表,然后在一些通过邮件的网申求职信上体现出来,这会让 HR 感到一种被尊重感,可能对求职有意想不到的好处;最后,简历一定要海投,不要怕麻烦。政府学院的专业大多属于基础类学科,找工作会比应用类学科的同学多付出一些努力和代价,大概的比例是每投 10 个获得一个笔试机会,每投 20 个获得一个面试机会,每投 50 个获得一个 offer。

* 汤明磊,男,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系 2013 届硕士毕业生。曾于 2011 年 6 月在浙江大学获得理学学士学位。

(二) 笔试关

笔试分行测、英语和专业测试几种,行测大体相当于国家公务员考试的难度,英语一般在六级考试的水平,这些都是大家可以提前准备的。一些做题过程中的小技巧需要大家慢慢摸索,比如行测训练先求快后求对,当时间来不及时先完成资料分析题,因为那部分的分值比例大等等。最重要的是在做行测的时候能给自己一个高度仿真的模拟环境,而不要反复翻看答案。十一月份的国考往往是大家复习的盲点,如果提前在暑假进行准备,或许能收到令人惊喜的结果。专业测试需要大家多花一点时间准备,比如我当时报考新华社,就提前一个多月开始浏览新华网、人民网、半月谈等相关网络里面的新华时评、人民时评和半月时评,上网除了刷微博人人,还会抽出一定时间看一下那里面的最新评论员文章,不用死记硬背,那样出来的文章没用,经常看才能慢慢找到感觉。或许写这类文章的诀窍就一个字“分”,或者从时间上分为即时效应、长期效应;或者从趋势上分为整体趋势和局部趋势;或者从层次上分为制度、政策和文化等,只要能做到深化细化具体化,就能保证有东西写。当时我笔试完新华社两个星期后接到新华社电话,说参考笔试内容和简历,决定免去面试,我相信“分”字诀应该是其中起到作用最大的。

(三) 面试关

这是求职阶段的重中之重,大公司有时甚至能持续到五面、六面。面试一般分为结构化、无领导和现场演讲三种。结构化面试方面,我因为做过公务员面试班的讲师,所以和很多面试老师有过交流,在他们看来,一个人从推门进入到坐下发声的 15-20 秒时间里,大概百分之 60% 以上的分数已经被打出,在回答中如果在 2 分钟之内仍没有任何亮点,分数基本就确定了,因此虽然不鼓励大家改变长相和声音,但是也希望大家注重自己形体、仪态方面的训练,第一印象下的气质气场培养绝对会有助于提高你面试的成功率;另外,近年来结构化面试的新形式是 free talk,在保利第三面的时候,广州公司的 HR 正好有事来天津,我们就在 90 咖啡馆进行了一次面试。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当时前半个小时他一直在貌似愉快的谈话中给我压力面,但又装得很轻松,比如他开头第一句就是“一直听说浙大是个很水的学校,你怎么看”,这时候不卑不亢应该是一个不错的态度,如果还能继续加点风趣幽默就更完美了。比如我是这么回答他的,紫金港、西溪、玉泉、之江、华家池,浙大的每一个校区都带着水字,浙江两字的一半都是水,所以浙大肯定是中国最水的大学,但是我争取出来的时候不做水货。结构化面试最重要的就是自我介绍,它是第一个能给面试官直观印象的东西,切忌不要给自己准备一份呆板空洞的自我介绍,把自己变成复读机重新读一遍简历,那样非但对你一点帮助都没有,甚至会让面试官觉得你空洞无物,起到减分的效果,不说点什么新鲜的是刺激不了一个长时间处于面试环境里的面试官的。什么是新鲜出彩的呢?给大家举我和我两个好朋友的例子,比如我准备的是四化:全面化的教育背景、均衡化的文理发展、高效化的工作模式和旺盛化的适应能力,虽然听着很矫情,但是面试官至少记住了“四化”这个点,给他留下了一点印象;我的一个好朋友准备的是三手:实习工作是新手,学生工作是好

手, 科研工作是能手; 我另一个好朋友准备的是一二三四五, 一篇期刊论文, 两个专业学位, 三次实习经历, 四次一等奖学金, 五年学生工作经历等。以上三个例子虽然都不是自我介绍中的经典出彩案例, 但是至少会给面试官与众不同且逻辑清晰的感觉, 希望师弟师妹在准备自我介绍时有这个意识。至于无领导小组面试方面, 想跟大家分享我在格力面试的经历。当时我们要用五个词构想一篇文章, 当时抽风的我说了一个星球大战的故事, 毫无悬念地被有个哥们编的人生抉择最后还联系到格力发展高度的故事给 PK 下去, 我后面的选择是支持那个又红又专的故事, 并由此丧失了话语权, 但结果竟然我们那一组就我进到了下一面, 所以无领导不一定要抢 leader 和 timer, 亮点、风度甚至与坐在一旁面试官的眼神交流都有可能帮助你晋级。关于即兴演讲, 我送给大家四个字: 点破解承, 先点题, 次而分析原因, 然后说一下对策, 最后拔一下主题, 百试不爽, 说一个部分的时候心里快速准备下一个部分, 增加了你的逻辑感之外也消除了你的紧张。

二、校园生活感悟

我关于求职部分的粗浅经验已介绍完毕, 下面是真情告白部分。

从哪儿开始说呢? 我想了很久, 就从这段时间很火的电影《致青春》开始说起。不知道大家对青春的定义是什么? 个人对青春的定义是当你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 并且努力去追赶、争取的时间。

我硕士期间的专业政治学有两大主题, 一为选择, 一为平衡。细细想来, 这与我们人生的主题其实是重合的。现在一般分为两种情况, 第一种是大家往往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为什么读书、为什么深造、为什么工作、为什么成家, 迷迷糊糊恍恍惚惚就走过了半生, 只是在夜深人静或者酩酊大醉时才突然发现内心的空虚; 第二种是大家觉得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也一直在为自己想要的坚持不懈地努力, 比如很多同学会说想要的就是比以前过得好, 但这个“好”是什么? 是想让别人觉得你“好”还是自己觉得“好”? 这一点是他们没有关注到或者是不想关注到的, 所以这类情况下他们只不过是知道自己需要追求什么。

现在很多人的人生选择不知从何时起被划成苍白无力的公务员、出国、国企、外企、民企等几类, 大家提到考研就是跨考金融, 提到工作就是进央企或者五百强, 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要去, 仅仅只是因为显得似乎很体面并能保证经济能力吗? 除了这个还有没有其他的因素? 我以前在一篇文章里写到, 一个人求职的过程是心理人、自然人和社会人的博弈过程, 心理人代表喜不喜欢, 自然人代表适不适合, 社会人代表体不体面。最好的职位当然是三者的完美统一, 然而如果不能保证三者的完美统一的话, 完全屏蔽掉第一个和第二个, 个人感觉并不是明智的选择。

一个人一生一般都在不由自主地寻找并收获四种感觉: 祥和感、美感、优越感和快感, 当意识不再占据你大脑的主导地位时, 一般人常见的生理反应是跟着感觉走。希望大家不要做感觉的奴隶, 尤其是优越感的奴隶。

我再说说个真人真事。我在本科的时候认识一个很优秀的同学，他是浙大经院平均学分绩点第二名，当时毕业季他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年薪 30 万的贝恩咨询，一个是清华经管的研究生。他最后选择了第二个，但是他跟我的聊天让我到现在还印象深刻，他说：“我现在已经没有任何理想了，也没有任何判断标准了，钱已经成了我唯一的标准，如果我从清华经管出来找不到 30 万以上的工作，我就判断当初这个选择是失败的。”希望大家能够在求职道路上也多考虑考虑这样的选择问题。

冯唐曾经说过，世界是一棵倒着生长的树，下面是多个分岔的入口，上面是同一个根，在这个根上面坐着的，就是佛。这句话我很赞同，在我看来，无论是工作、读研、出国甚至是待业，我们都在找一个和世界呼吸吐纳的入口，而问题是现在大家都特别在意这个入口的选择，这其实不应该是最重要的，最应该引起关注的是从入口到“根”的道路应该怎么走，走得好不好，走得远不远，这都比从哪开始走重要。

最后，完全不官方和客套地与大家分享四句话吧，谈不上期望和经验，都是我教训的总结：

第一，希望大家有概率意识，不要在买保险的时候觉得这万分之一的概率肯定轮不到我，而在卖彩票的时候经常想这万分之一的概率怎么就不可能是我？拥有了概率意识不仅仅会对你在买保险和彩票上有用。

第二，希望大家有独立意识，独立思考、独立做事、独立为人，不要为了太多的迎合表演你自己，表演出来的你必然是光鲜的，但也必然不是真实的。

第三，希望大家有团队意识，你的班级同学、你的协会好友、你的同门师兄都是你踏入社会的宝贵资源，抱团会增加你们成功的概率。

第四，希望大家有长期意识。条条大路通罗马，这不是一句虚话，不要为了短暂的求职大潮迷失了自己的方向，当年国企那么好，这其中有多少人能想到，没等他们到五十，那么多国企竟然会倒闭。

最后还是回到致青春上，用什么去致你的青春？不是别人如何欣赏你，而是自己如何认可自己！

【毕业感言】

永远的 09 国政

从大学入学的时候就想着四年后的我会是怎样、写下毕业感想时又该是多少失落与感伤，但是真正这一刻到来心情却反而平静。四年的时光我真的成长了很多，对自己对未来尽管迷茫但是已有了模糊的向往和方向，伴我经历四年的同窗、良师以及



我内心最深的依赖——家人，这所有的点滴都将是我最珍视可贵的回忆，也将成为继续逐梦的动力。将我最真诚的祝福与期盼给予我最亲爱的你们，一切顺利，09 国政，加油加油，我们友谊长存！

——2009 级国际政治本科生 权贤美

四年时间，岁月蹉跎，从此以后，天高地远。

——2009 级国际政治本科生 黄星

时间一晃而过，大四毕业又要开始新的生活了。很感谢南开和我的老师同学们，在这四年里陪伴我成长，我胡汉三还会再回来的。

——2009 级国际政治本科生 龚秀娟

愿敬爱的老师们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愿亲爱的同学们都有一个灿烂的前程。我爱的 09 级，我们的毕业一定不会是分离，希望十年后的我们成熟而不沧桑，成功而不忧伤！

——2009 级国际政治本科生 刘志英

念念不忘旧日时光，若值得，便挽长歌。

——2009 级国际政治本科生 潘丽丽

难以忘怀 09 年的秋天踏入南开园的那一刻，难以忘怀 09 国政的第一次班会。眨眼间，我们就到了离别的 13 年夏天，4 年的大学生活，让我感受到了 09 国政这个大家庭的温暖和开心，感谢你们 4 年的相伴与帮助，不管以后我们地处世界的天南海北，我们永远都是 09 国政不可或缺的一员。

——2009 级国际政治本科生 蔡丽意

我也想留下，我也是爱南开的。

——2009 级国际政治本科生 汪佳

啊,就要可喜可贺地毕业了。毕业对于我来说大概就是“又一次新的机会”、“又可以从头再努力一次”这样的感觉。因为还会在南开,所以离开的实感并不强烈。希望错过的东西还有机会弥补,说了再见的朋友、同学还能再见,最初的心情不会被遗忘。但愿所有人都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人生。

——2009 级国际政治本科生 朱珂虹

我在美丽的渤海之滨度过了快乐充实的大学本科四年,在政府学院大家庭与志同道合的伙伴们一起探寻人文社会科学的魅力。毕业之际,衷心祝愿南开永远年青!

——2009 级国际政治本科生 江育恒

珍惜大学的青葱岁月,来过、疯过,就足以慰藉!献给所有即将毕业和还未毕业的同学们。

——2009 级国际政治本科生 祝华忠

走入大学,稚气未脱。如今毕业,我却希望能够永远保持着这一份天真和孩子气。这是大学送给我最好的礼物。

——2009 级国际政治本科生 杨京欧

好好学习,少扯淡。

——2009 级国际政治本科生 朱俊帅

四载光阴转瞬即逝。无论苦乐得失,大学四年于我都是不可磨灭的记忆。祝同学们都能有好前景,学弟学妹能够不负光阴,过好自己的生活。

——2009 级国际政治本科生 姜忆楠

炎炎夏日,竟是惜别之时。莫叹息,齐努力,创佳绩。后会有期,再叙青春情谊。

——2009 级国际政治本科生 马逸群

希望大家不管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都能以演主角的心态演好每一个角色。

——2009 级国际政治本科生 陈超

时光荏苒,短暂四年的大学时光悄然而逝。虽然以后从事的可能不与国关相关,但不得不说对国关的学习是我一辈子最珍贵的财富。感恩国关,感恩南开!

——2009 级国际政治本科生 陈宁

大学四年时光转瞬即逝,但我面临毕业,只能期盼流走的仅仅是时间,和同学的友谊能天长地久。

——2009 级国际政治本科生 陈鹭

四年既已终,一腔热血喉上涌,剑下悲声恸。

——2009 级国际政治本科生 董柞壮

虽说相聚离开,总有时候。但当这一刻快要到来时,我们真的不想说再见!四年里的点点滴滴早已让我们每个人都深深镌刻了 09 国政的印记。不管这四年是充实还是遗憾,我们都一起走过;就算聚散天涯,这四年都将永远成为我们共同的回忆。毕业的分别是新的征程

的开始,愿我们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梦想蓝天!最真挚的祝福给我们的 09 国政!

——2009 级国际政治本科生 石宇

【恩师寄语】

大学时光转瞬即逝,在你们即将离开菁菁校园,奔赴前程之际,唯愿大家驰骛于现实且能徜徉自怡于大学时代的精神家园。

——王翠文(南开大学国际关系系副教授)

作为国际政治专业的毕业生,自然应当有胸怀天下的情怀。我们不当为中国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排名上升而沾沾自喜,而应当为改善中国底层百姓的生活水平继续奋斗!中国目前还不富裕,我们的人均收入水平还列在世界末位。你们是社会期盼的天之骄子,社会需要你们的担当。在中国广阔的疆域和各种事务领域,有很多的事情需要你们去做,这是你们的舞台。相信你们必定能够在自己选定的领域中一展身手,做出自己的成绩,我期待着早日听到你们的好消息。

——杨雷(南开大学国际关系系副教授)

送给即将毕业的同学们“三业”,一是学业有成,大家部分已完成部分还将继续深造;二是事业腾达;三是家业幸福。

——霍特(南开大学国际关系系讲师)

希望即将走上工作岗位或进入新的学习阶段的同学们能继承南开人踏实稳重、严谨实干的作风,尊重传统而不拘泥于传统,善于创新而不盲目激进,敢于质疑而不过于自信。祝各位国政专业的毕业生前程似锦!

——刘兴华(南开大学国际关系系讲师)

祝愿同学们工作、求学顺利,前程似锦!

——阎梁(南开大学国际关系系讲师)

借用五月天的歌词祝福毕业生同学吧:“青春彼岸,盛夏一天一天的灿烂;让天空解释着蔚蓝,浮云定义着洁白,落花铺陈一片红色地毯,迎接你们精彩的未来”。

——杨娜(南开大学国际关系系讲师)

谨祝同学们前途似锦,鹏程万里!

——袁燕(南开大学国际关系系讲师)

国际关系系 2013 届部分毕业生毕业去向

姓名	年级	学位论文题目	指导教师	毕业去向
杨吉平	博士	人性、历史与冲突——古典现实主义核心思想再思考	张睿壮	对外经贸大学
李金潼	硕士	中国参与国际公共产品供应研究	吴志成	南开大学读博
徐芳宇	硕士	联合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作用	吴志成	中国移动浙江分公司
赵圆圆	硕士	英国参与全球治理分析	吴志成	中国农业银行
李丹	硕士	德国参与全球治理分析	吴志成	南开大学图书馆
刘长君	硕士	美国参与轻小武器国际非法贸易的动机和影响	张睿壮	沈阳药科大学
李伟	硕士	中国对外交往中的人权问题	韩召颖	山西农业大学
管传靖	硕士	领导权问题对国际制度设计的影响分析	赵龙跃	清华大学读博
王乾炜	硕士	美国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进程及中国的应对策略	赵龙跃	招商银行天津分行
田钊	硕士	中美在非洲的能源竞争	徐振伟	中粮大悦城(天津)有限公司
姜忆楠	学士	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浅析	吴志成	南开大学读研
石宇	学士	中国负责任大国战略浅析	吴志成	南开大学读研
朱珂虹	学士	二战后美国的发展援助	徐振伟	南开大学读研
董柞壮	学士	联盟类型、机制设置与联盟可靠性	刘丰	南开大学读研
权贤美	学士	国际制度国内化浅析——以中国入世为例	刘丰	清华大学读研
任娟	学士	当代中国不结盟战略调整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刘丰	南开大学读研
马逸群	学士	乌兹别克斯坦近年来在上合组织国家与美国博弈中倾向性的转变	杨雷	南开大学读研
陈鹭	学士	浅析文化外交——从美国之音到孔子学院	霍特	南开大学研究生支教团
高翔宇	学士	美国外交战略中的宗教因素	霍特	南开大学研究生支教团
江育恒	学士	东亚区域合作的问题与前景——基于东亚意识的视角	刘兴华	浙江大学读研
汪佳	学士	文化产业与韩国文化外交	刘兴华	保利地产
祝华忠	学士	网络媒介与美国外交议程的变化	刘兴华	普华永道

蔡丽意	学士	发达经济体的量化宽松政策出台后国际货币的协调与冲突	阎 梁	厦门象屿集团有限公司
龚秀娟	学士	拉美国家为何难以走出“中等收入陷阱”——以巴西为例	阎 梁	招商银行
黄 星	学士	包容性增长的评价指标及国际经验	阎 梁	中信银行
潘丽丽	学士	后发国家如何突破中等收入陷阱——以六七十年代韩国为例	阎 梁	建设银行
孙绶志	学士	选择单边还是多边? ——国际经济制裁的效率差异解析	阎 梁	中国人民大学读研
熊方兴	学士	中国崛起与东盟国家对外战略选择	黄海涛	中信银行
朱俊帅	学士	网络自由与美国的网络外交政策	黄海涛	宁波市海曙区人社局

[整理: 郭晓琼、程 康、李安琪]

[责任编辑: 郭晓琼]

英采飞扬

【编者按】本期共收录三篇文章，前两篇为学生习作，对日本众议员参拜靖国神社及钓鱼岛等热点问题进行了探讨，阐述了自己的看法。第三篇文章则对马克思·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的内容作了简要介绍。

♣Short Essays♣

Arguments about Yasukuni Shrine

Chen Jiadi*

Not long ago in April 23rd, a large scale group of Japanese policy-makers made a formal visit to Yasukuni Shrine again to show respect for those war criminals died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which made Chinese people much annoyed because Japan has hardly recognized its crimes and mistakes since 1945.

Arguments about Yasukuni Shrine have existed for over 30 years. In 1978, Yasukuni Shrine added 14 first-class criminals to its memorial tablets, and since then, Yasukuni Shrine has always been regarded as a symbol of Japanese militarism by pacifists, peacenik, victorious nations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and countries or regions that were once invaded by Japan.

But in Japan, people who agree to this kind of visit take it for granted and insist that they have the right to show respect to those war criminals. They believe people will become Buddha after they die and they complain that other countries should not interfere with their cultural tradition as well as personal belief. Some Japanese also think that Chinese people are so narrow-minded and China should not constantly require them to suffer the crimes caused by their predecessors.

So here comes the problem. China often regards Yasukuni Shrine as a disrespect to that period of shameful history from a political perspective while Japanese stress more on the cultural aspect of Yasukuni Shrine.

Let us think that both China and Japan should be rational on this issue. China may consider more about Japan's history and culture, and Japan should also see the political aspect of Yasukuni Shrine. If we just stick to our own standpoint toughly and let our minds controlled by emotion, the misunderstanding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will make a bad influence on the further cooperation in economy as well as hurting people's feelings of the two countries.

* Chen Jiadi is a freshman,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Zhou Enlai School of Government, Nankai University.

Arguments about Diaoyu Island

Feng Xiaoxuan*

On September 10th, 2012,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announced its decision to “purchase” China’s Diaoyu Island. In response to it, Chinese government expressed solemn position and adopted strong countermeasures, the Chinese people voiced strong indignation against the Japanese’s move, and the voice of justice and great alarm was heard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t is known to all that Diaoyu Island and its affiliated islands are an inseparable part of the China’s territory. In terms of history, geography and legal Diaoyu Island is China’s inherent territory in all historical, geographical and legal terms, and China enjoys indisputable sovereignty over Diaoyu Island. Therefore, Japan’s usurpation of China’s Diaoyu Island is illegal and invalid. Japan has undeniably committed gross infringement upon China’s territorial sovereignty. But it is playing the victim now by accusing China of “putting it under threat”. This is so absurd, because China has never threatened any country and won’t put any country under threat either.

In my opinion, there are several ways for China and Japan to solve the existing problems. Firstly, dialogue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including official and civil dialogues is needed. Deepened dialogues and communication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re essential in leading to a smoother way to the resolution of disputes and conflicts.

Besides, both China and Japan should seek for common interests with a further vision and a more strategic perspective. Obviously, conflicts in interest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re inevitable in their course of development. Except for facing and solving conflicts, we should also see our mutual cooper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in the field of economy, as well as our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Therefore, both countries should take a right perspective to see our mutual relations, especially Japan.

It is also necessary for both countries to have a right understanding about history, learning lessons and experiences from it, and look forward to a broad mind to building a solid foundation for our mutual exchange,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nly by doing those can we see all problems more clearly.

The Comment on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Zhou Zheng**

All people aim to seek profits, which is regarded as their duty and job, so concentrating on

* Feng Xiaoxuan is a freshman,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Zhou Enlai School of Government, Nankai University.

** Zhou Zheng is a junior, Department of Social Work of Zhou Enlai School of Government, Nankai University.

earning money is a kind of virtue. This is the capitalism spirit that Weber wants to convey in his book. And capitalism contains the essence of treasuring time, hardworking, integrity, thrift and the desire for money. Weber summarizes the Protestant ethic as Beruf conception and asceticism. Beruf conception encourages people to do some labor work and seek profits. Asceticism includes two basic points. One is to limit consumption, control the way of living and boycott the unnecessary consumption, and the other is keeping in good faith behavior.

Weber uses the word “elective affinity” to describe the inner link of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The essential spirit of capitalism has a large part in common with the Protestant ethic, which are naturally suitable for capitalism because they respect labor, thrift and acquiring wealth. For this reason the Protestant can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Nevertheless, traditional Catholicism pursues luxurious consumption and objects to labor and making a fortune. Therefore it inhibits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t economy.

Though Weber’s work,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s classic. But it also has some disputes.

The central point in this book is that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motivate the booming of capitalism.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is the basis of the birth of social systems. This is opposite to Marxism opinion that the birth of a certain ideology must rely on a set of systems.

Weber insists that the Protestant ethic formed after the reformation made up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while the capitalism began to flourish in Italy, 14th century. Besides, liberal economic theory was developed by French and Italian Catholics.

Catholicism does not absolutely reject capitalism. And some other scholars criticize that Weber shows a superiority feeling that only western Protestant ethic can produce capitalism in this boo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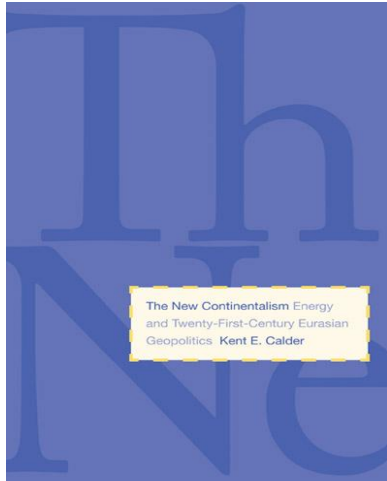
However imperfect the book is, it is still a great masterpiece in the history of sociology.

[编辑: 彭紫嫣、任 娟、王宝盆]

[责任编辑: 王宝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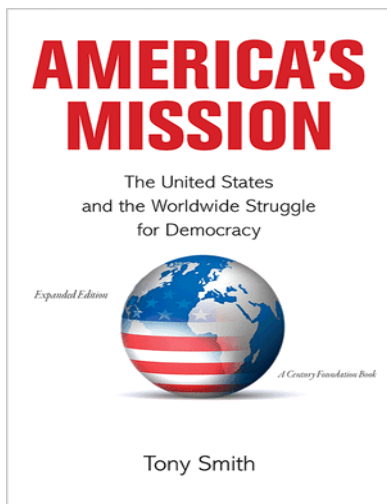
新书架 (二)

【编者按】随着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两极世界轰塌为美国的单极世界，世界事务中的美国因素几乎无处不在。正如俞可平所言：全球化，实质上就是“第三世界的美国化”。本期新书架就试图带领读者走进美国缔造的“单向度的世界”，感受美国对全球事务的思考探索及其经验教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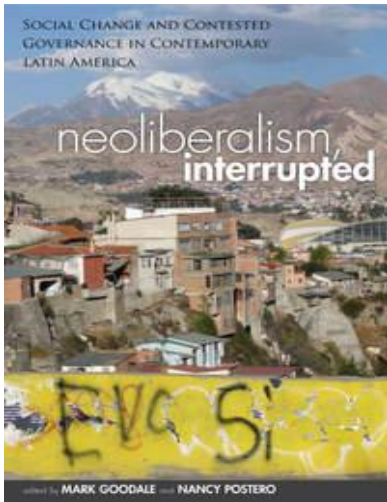
肯特·卡尔德龙：《新大陆主义》，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2012年。(Kent E. Calder, *The New Continentalis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2.)

在这本被外界评价为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书中，作者认为在后伊拉克时代，一个由经济增长、旺盛的能源需求推动、具备弥合既有地缘政治分歧能力的新的跨国合作机制正在亚洲形成。这个新合作机制被作者视作东亚和中东间的“新丝绸之路”，并认为它的最终形成将标志着“这个世界上最重要多边合作架构之一”的诞生。在作者看来，“新丝绸之路”实际上代表着由能源和贸易推动的欧亚大陆的进一步联合和美国在该地区影响力的进一步缩小，美国必须意识到做出有效应对战略的重要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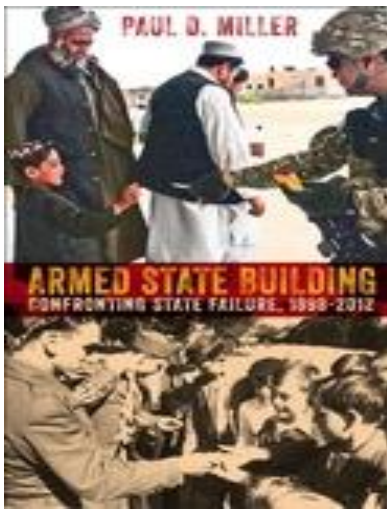
托尼·史密斯：《美国的使命：美国和全世界的民主奋斗（扩展版）》，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2年。(Tony Smith, *America's Miss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wide Struggle for Democracy (Expanded Edi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2.)

美国的使命就是世界的使命。本书认为，当今世界民主理念的实力和威望，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在本书中，作者记录下美国如何使用外交策略在全世界推广民主的历史。这其中既包括美国在日本和德国所取得的巨大胜利，也包括美国在拉美、越南和世界其他地区所遭受的重大挫折。此外，本书还披露了美国在克林顿、小布什和奥巴马任内传播民主的尝试，以及美国在“阿拉伯之春”中的作用。



马克·古达尔、南希·由后主编：《新自由主义,断裂的——当代拉丁美洲的社会变革和争议治理》，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13年。（Mark Goodale and Nancy Postero eds., *Neoliberalism, Interrupted-Social Change and Contested-Governance in Contemporary Latin Americ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新自由主义的治理形式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拉美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生活。本书试图展现新自由主义治下的拉美的政治和社会变化。在研究方法上，本书收集的前沿研究案例没有按照传统的二分法思维模式，如新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右派与左派、土著与混血、国内与跨国来理解拉美地区的变革。相反，本书采取了梳理近期拉美国家对新自由主义霸权的日趋分散化和多样化的回应的方式来理解新自由主义对拉美地区的社会变革和国家治理的影响。在本书中，透过大量新近详实的案例，一个新自由主义治下希望与矛盾共存、喜悦与痛苦同在的拉丁美洲政治社会图景可谓一览无余。



保罗·米勒：《武装国家建设：面对失败国家，1898-2012》，纽约：康奈尔大学出版社，2013年。（Paul D. Miller, *Armed State Building: Confronting State Failure, 1898-2012*,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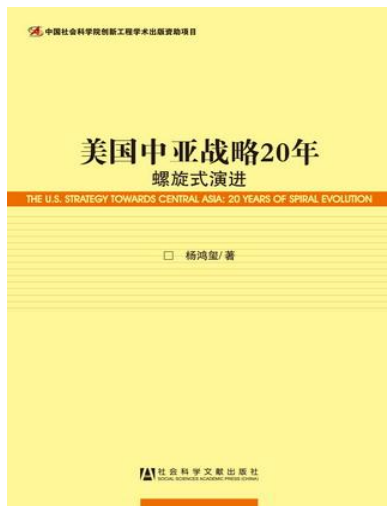
自1898年以来，美国和联合国已经部署了超过三十二次军事力量以试图重建失败国家。在本书中，作者依据其近10年来在美国军方、情报界和政策界的工作经验，力图解释导致武装国家产生的原因，并总结国际自由主义力量在失败国家重建问题上的成败得失。同时，作者还在书中概述了失败国家的不同类型，分析了自由主义国家进行干涉的不同层次，并对其中的成败案例进行了归类。透过本书，一幅长达114年，先后涉及西德、日本、西北非洲、中亚等国家和地区的世界失败国家治理史大幕将徐徐拉起。



[美]罗伯特·卡根：《美国缔造的世界》（刘若楠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

2008年以来，由于始自美国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对西方国家的负面冲击，以及以中国为代表的非西方世界的崛起，美国的主导地位及其所代表的治理模式的稳固性都在受到深刻质疑，这也引发了美国知识精英在相关问题上的激烈争论。在本书中，罗伯特·卡根继续为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外交政策理念进行鼓吹和辩护。作者反驳了认为美国已经衰落的论调，强调了美国在构建和维持一个和平稳定、自由民主的国际秩序中所起到的巨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意在提醒人们美国没有衰落，美国为维持目前世界秩序的努力值得继续下去。作者认为，“衰落是一种选择，而不是一种必然的命运”，是衰落还是走向新的辉煌，选择权依然在美国人手中。

们美国没有衰落，美国为维持目前世界秩序的努力值得继续下去。作者认为，“衰落是一种选择，而不是一种必然的命运”，是衰落还是走向新的辉煌，选择权依然在美国人手中。



杨鸿玺：《美国中亚战略20年：螺旋式演进》，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

2011年正值苏联解体20年，而美国在这二十年间的中亚战略的形成与发展，与苏联解体无疑是密切相关的。本书从国际关系理论的视角审视美国外交脉络中的中亚战略，对中亚的战略地位、国际关系理论视角下的美国与中亚、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的外交与中亚战略、美国对中亚的基本战略目标、美国中亚战略的发展阶段、美国实施中亚战略的基本路径、美国对中亚战略的多重性后果、美国对中亚战略的制约因素以及奥巴马政府中亚战略的现状与展望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对美国中亚战略问题进行了全面论述，堪称国内目前最为系统论述该问题的专著。

望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对美国中亚战略问题进行了全面论述，堪称国内目前最为系统论述该问题的专著。

[整理：李 漩、李冰莹]

[责任编辑：胡阳阳]

♣系内新闻♣

爱德华·法墨讲座：中国不断增强的全球角色

(通讯员：任 娟) 2013年5月6日上午十点，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著名中国史专家爱德华·法墨(Edward Farmer)教授在范孙楼116会议室举办了题为“中国不断增强的全球角色”的讲座。讲座由南开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和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主办。政府学院、历史学院、外国语学院、商学院等学院的部分师生参加了本次讲座。

讲座伊始，张睿壮教授介绍了法墨教授的学术背景。法墨教授在斯坦福大学完成了历史和哲学两门专业的本科学业。他在哈佛大学攻读了硕士和博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是东亚地区研究。法墨教授是南开的老朋友，曾在1983年、1986年带明尼苏达大学的学生来南开学习中文。

随后，法墨教授进行了题为“中国不断增强的全球角色”的演讲。法墨教授首先梳理了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40年代中国的历史演变，他说，20世纪70年代后中国逐渐融入国际体系和参与国际事务，扮演的全球角色也越来越重要。中国的表现也足以表明中国是“全球社会中负责任的一员”。



接着，他分别说明中国在各个区域性组织中的行为与地位。中国在东北亚地区为朝鲜问题的解决积极斡旋，多次促成六方会谈。积极参与东南亚国家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双方经贸联系密切。中国参与创立和组织上海合作组织，该组织的成员国和观察国覆盖了亚洲大部分区域，对促进亚洲的区域安全与合作发挥着重要作用。

但是美国对此表示担心和不满，感觉这会削弱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力，并最终导致美国被排挤出亚洲。此外，中国在亚太经合组织、欧亚峰会等泛区域合作中也很活跃，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和空间都有了很大提高和扩展。

最后，他指出中国当前面临着与其他国家的领土争端等问题。中外对新疆、西藏、台湾等地区的争论，以及中国在南海问题上与菲律宾、越南、印尼等国的争端都在短时间内难以解决。而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与日本的争端已经严重影响了双方经贸关系的发展。这些都是中国未来发展中的一些可预见的障碍。

演讲完毕后，法墨教授对在座同学的问题进行了细致的回答，风趣的语言和严谨的态度也让大家印象深刻。

孙振宇大使讲座“多边贸易体制面临的挑战”

(通讯员: 谷天一) 2013 年 4 月 27 日, WTO 事务专家孙振宇大使做客南开大学, 在经济学院报告厅举行了题为“多边贸易体制面临的挑战”的讲座, 并与南开师生就此专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该讲座由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主办, 南开大学中国国际发展研究中心协办。

讲座由南开大学副校长佟家栋教授主持。讲座伊始, 孙振宇大使赞扬了南开的悠久历史、踏实学风、骄人成就, 随后对当前贸易体制尤其是 WTO 面临的问题与挑战提出了深入而独到的见解。

孙振宇大使首先指出, 尽管存在多哈回合进展缓慢等问题, WTO 机制依然有效, 其三大主要功能——贸易政策审议、贸易争端解决机制、贸易规则的制定与修改——只有 WTO 谈判功能的发挥部分受限, WTO 短时间内不会被取代。针对各种地区合作(如自贸区谈判)如火如荼进行的现实情形, 孙振宇大使从贸易转移、最惠国待遇原则、海关成本变动、部长任期以及政策碎片化等角度进行了评述, 并指出自贸区谈判既是趋势, 也是现实, 中国必须参与到相应自贸区的构建。孙振宇大使还指出我国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 既有来自外部打压, 包括美国在亚太推出 TPP 和推动美欧自贸区建设; 也有国内因素, 特别是中国缺乏整体战略, 贸易政策尚未能与国内改革完全配套。最后, 孙振宇大使对中国应如何应对挑战提出独到而深入的观点。他指出, 中国应高举多边主义旗帜, 站在道义制高点, 推动多哈回合谈判; 在自愿基础上承担更多国际责任; 还应培养同时精通双边谈判与多边谈判, 掌握经济、法律、国际关系相关知识的复合型人才, 以便在多边场合推进务实性双边合作。

在互动提问环节, 孙振宇大使与现场同学就如何培养复合型人才、新一任 WTO 总干事人选、完善 WTO 争端解决机制以及中国应如何参与自贸区建设等问题进行了交流。孙振宇大使系统、深入的回答赢得了在场同学们的热烈掌声。

孙振宇大使长期在原对外经济贸易部和现在的商务部工作, 曾任外经贸部地区政策司副司长、美洲大洋洲司司长, 1994 年 11 月出任外经贸部副部长。2002 年 1 月 17 日至 2011 年 2 月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世界贸易组织代表、特命全权大使, 兼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副代表, 为我国参与完善多边贸易体制做出了重要贡献, 于 2011 年 3 月出任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会长。孙振宇大使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 英语娴熟, 既具有渊博的国际经济贸易理论知识, 又具有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

卡耐基国际和平研究中心汤姆·卡弗和保罗·韩磊做客南开

(通讯员: 王芳琳) 4 月 17 日晚 7 点, 卡耐基国际和平研究基金会副总裁汤姆·卡弗(Tom Carver)和清华-卡耐基全球政策中心主任保罗·韩磊(Paul Haenle)做客南开大学, 在范孙楼 116 会议室分别为南开大学的学生带来了题为“国际媒体和国际事务”和“中美的新

型大国关系”的讲座。活动由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南开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中心主办。

在题为“国际媒体和国际事务”的讲座中，汤姆·卡弗提到在过去40年中世界各国媒体的形式和数量都在急剧增加。媒体的控制权从少数人转移到民众手中，呈现民主化的趋势。其次，媒体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力不断增加。由于当今信息和思想的传播极为迅速，所以一旦公共政策出现任何问题，媒体都会迅速做出反应，从而推动公众也迅速做出反应，促使公共政策做出调整，由此形成了媒体对公共政策影响的基本机制。

保罗·韩磊在讲座开始之前，首先就“现场有多少人去过美国？”、“去过美国的同学们是否喜欢美国？”、“大家对中美关系今后的发展乐观还是悲观？”、“大家是否认为美国在压制中国？”等问题对现场同学进行了调查。保罗表示自己提问题的目的就是想了解目前中国学生对于中美关系的一些想法。在之后的演讲中，他讲述了1979年中美建交以来的中美交往史。通过结合自己在美国政府中的工作经历，他表示中美需要寻求合作机会，而且美国政府也迫切希望与中国进行国际合作。最后，他将这一问题留给了现场同学，希望大家共同思考中美可以进行合作的领域。

在互动环节，两位学者与现场同学就美国政府在波士顿爆炸事件中的反应、国际媒体与公共政策如何相互作用、美国希望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怎样的作用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讲座结束后，同学们纷纷表示受益匪浅，希望可以多参与类似活动。

汤姆·卡弗曾在英国BBC广播公司工作近30年，报道了大量重大国际事件。保罗·韩磊曾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一名军官，参与了“沙漠风暴”行动，曾两次在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工作，并于小布什任内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中国、中国台湾、蒙古事务科”担任执行助理，对中国有深入的研究。

美利坚大学赵全胜教授讲座： “美国亚太战略转型与钓鱼岛之争”



(通讯员：吕海 摄影：张晓康) 2013年5月31日下午两点半，来自美利坚大学的赵全胜教授在南开大学范孙楼440会议室主讲题为“美国亚太战略转型与钓鱼岛之争”的讲座，为南开的学子献上了一场精神盛宴。本次讲座由南开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和南开大学国际关系系主办。国际关系系的主要负责人出席了本次讲座。

讲座伊始，南开大学国际关系系主任韩召颖教授首先向大家介绍了赵全胜教授。随后，赵全胜教授开始向大家做讲演。他首先向大家提供了一些关于美日关系和中日关系的背景知识和相关材料，并着重介绍了美日同盟的发展历史以及在九十年代的中国崛起和第三次台海

危机。随后，赵全胜教授强调了一个影响美国外交决策的重要因素——“战略行动体”，这也反映了一个在美国很有特点的现象——“旋转门”。

关于对日政策，赵教授介绍了由“哈佛帮”成员组成的“三驾马车”，他们分别是：作为“总设计师”的小约瑟夫·奈（Joseph Nye），作为“重要顾问”的傅高义（Ezra Vogel）和作为“政策执行者”的库尔特·坎贝尔（Kurt M. Campbell）。正是这三个人推动了九十年代美国对美日同盟的重新定义。

而在现在美国“重返亚太”的战略背景下，美国对中日钓鱼岛争端持如下态度：第一，继续保持对日承诺，强调日本在美国大战略中的重要性，以此来保证其对盟友的可信度；第二，在主权问题上不站边，这样一来对中国也有交代；最后，提倡中日两国和平解决争端。

最后，赵教授认为，美国国内的“战略推手”对我们有很多启示：需要志同道合的团队；团队要有基本的训练；要敢于有反抗潮流的精神；需要有宽松的、允许政策辩论的良好环境；需要有人才培养的机制。

讲演完毕后，赵全胜教授耐心细致地解答了同学们的问题。最后，由南开大学国际关系系的张睿壮教授对本次讲座做了风趣幽默的总结，整场讲座也在大家的笑声和掌声中落下帷幕。

赵全胜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博士学位，现任美国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亚洲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同时担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客座教授、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兼职教授，也是全球华人政治学家论坛总协调人，主要研究领域为比较政治学、国际关系，侧重东亚国际关系方向，已出版专著十余部，发表学术论文上百篇。

♣校外短讯♣

北京大学

●2013 年 4 月 8 日上午,“中美能源安全合作”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举行。本次研讨会由美国驻华大使馆提议,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办。来自美国国务院和美国驻华使馆的官员与中国的能源政策和能源研究人员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了能源安全与合作的话题。近年,美国的能源生产正在改变国际能源供销格局,中美如何应对各自对该领域中问题的关注,以求将能源作为增进互信的领域之一。

●2013 年 5 月 13 日上午,第八期第二梯次“台湾大学—北京大学校园精英计划”项目始业式在国际关系学院 C105 会议室举行。台湾大学政治系助理教授兼台大领队童涵浦老师和团长杨浣婷带领 16 名台湾大学政治系的本科及研究生同学到访我院,北京大学台湾研究院执行院长李义虎老师,国际关系学院印红标老师、张植荣老师以及国学院的 16 名学生参加了欢迎仪式。

复旦大学

●“中国与 G20: 中国对新型全球经济治理的贡献”学术研讨会于 12 月 3 日-4 日在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举办。本次会议是该院与德国波鸿鲁尔大学东亚政治系联合举办的“全球金融危机下的全球经济治理政治学系列研讨会”的第二次会议,建立在今年 11 月初在波鸿鲁尔大学举办的第一次会议“中国, 欧盟与全球金融市场的重组: 走向新型全球经济治理”的基础上。来自中国、德国、韩国、加拿大、新西兰等国家的学术机构的学者参与了本次研讨会,探讨在各方努力解决 2007 至 2008 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的同时也重塑了全球经济的情况下, G20 在全球经济新秩序发展中起到的作用。系列研讨会采用跨学科和跨国方法研究全球经济治理。本次研讨会着重讨论在新型全球经济治理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对于 G20 的贡献和作用,并检验中国在全

球和区域范围内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以及这些关系在 G20 内的作用。

清华大学

●2013 年 4 月 8 日,张利华教授在清华一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主持了“欧债危机中德国的立场”演讲会,来自波兰华沙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教师拉斐尔·乌拉托夫斯基(Rafal Ulatowski)博士做了主题演讲。与会的专家学者参与了讨论并提出了各自的观点。Philippe Vialatte 博士介绍了目前中国与欧盟合作研究项目,向国关系的中外学生提供了欧盟驻华机构实习机会的有关信息,随同 Vialatte 主任前来的两位实习生也到场跟同学们分享了他们的实习经验。

人民大学

●2013 年 3 月 27 日,“北美能源独立对中国的影响”国际会议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此次会议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能源战略研究中心(CIEESS)与英国牛津能源研究所(OIES)共同举办,为两家联合研究项目的活动之一。参加此次大会的有来自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中国工程院、国务院政策室、中国国际问题基金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北京大学、中石油、中海油、中石化、英国驻华大使馆、俄罗斯科学院能源研究所、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NRDC)、美国世界资源研究所(WRI)、英国石油公司(BP)、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凯恩克劳斯基基金会、博源基金会、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等几十家单位,云集了能源政治、能源经济、能源金融、能源关系、能源技术各界的顶尖学者以及主要能源企业的研究人员和政府政策制定部门高级官员。

[整理: 杨 雪、刘雨晨]

[责任编辑: 杨 雪]

南开大学国际关系系科研简报

(2013年3月——2013年6月)

1. 吴志成、朱旭:《欧盟对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救助》,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

内容摘要: 欧债危机发生以来,希腊、爱尔兰、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等危机发生国纷纷采取财政紧缩政策,强化财政纪律,削减赤字和债务,推进结构性改革。欧元区国家出台大规模救市政策,创立和启动金融救助机制及“欧洲学期”机制,运行新的监管框架,不断向希腊等国提供紧急救助。欧洲央行也采取一系列措施提升市场流动性,减少金融市场波动,推出长期再融资操作。目前对危机的救助呈现德法主导、缺乏民主、决策滞后、后果严重、治标不治本等特征。危机的彻底解决要求欧元区国家继续以“友好型增长”方式进行财政整顿,不断深化欧洲一体化,创设欧洲货币基金,并以综合方式加强欧元区经济治理改革。

关键词: 欧盟; 主权债务危机; 欧洲央行; 结构性改革

作者简介: 吴志成,男,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欧洲一体化、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等;朱旭,男,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2011级博士研究生。

2. 韩召颖、宋晓丽:《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决策探析——小集团思维理论的视角》,载《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

内容摘要: 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决策从一开始就备受争议,文章拟从小集团思维理论视角,分析美国发动此次战争的原因。小布什领导下的“战争内阁”主导了此次决策的整个过程。决策具备引发小集团思维的前置因素:小布什领导的“战争内阁”具有较强的凝聚力,小布什个人体现出一种命令式的领导方式,情报部门之间缺乏相互信任、沟通和协调,小集团成员具有相似的从政经历,以及受到“9.11”恐怖袭击的冲击。决策的小集团思维表现突出,影响明显。小布什领导下的“战争内阁”对萨达姆政府存在着独裁政权等刻板印象,认为伊拉克在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如果与基地组织结合,将严重威胁到美国的安全。他们忽略负面的反馈信息,施压于内阁中持异议的成员,有意识地去寻找能够对伊动武的情报信息,把已确定的行动方案作为唯一正确、合理的方案,缺乏对潜在风险的细致评估权衡。小布什政府对伊战争决策明显受到了小集团思维这种非理性心理认知的影响。

关键词: 伊拉克战争; 小布什政府; “战争内阁”; 小集团思维

作者简介: 韩召颖,男,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美国外交政策、中美关系、国际安全、国际关系理论等方面的研究;宋晓丽,女,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2010级博士研究生。

3. 刘丰:《国际体系转型与中国的角色定位》,载《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

内容摘要:当前国际体系处于加速变动时期,学术界对国际体系的基本状态和发展方向存在诸多不同判断,反映出各异的理论偏好与政治立场。国际体系由实力结构、利益格局和观念分布等三项基本要素构成,充分理解这些要素可以为我们提供较为完整的国际格局面貌,并相对准确地判断其发展趋势。实力结构变化是国际体系转型的起点和物质基础,由此带来利益格局和观念分布的改变,这些要素的调整方式影响到国际体系能否实现和平变迁。中国崛起是当今国际体系调整的重要动力,这一过程本身也受到体系特征的制约。在国力持续提升推动实力结构变化的同时,中国需要明确作为国际体系的积极参与者与渐进改革者的角色定位,与其他新兴国家一道促成既有利益格局与观念分布的良性调整,推动国际体系的和平变迁。

关键词:国际体系;中国崛起;实力结构;利益格局;观念分布

作者简介:刘丰,男,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安全、东亚国际关系等方面的研究。

4. 杨娜:《欧债危机对金砖国家的影响及其应对》,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

内容摘要:欧盟是金砖国家最大的出口市场,欧债危机成为阻碍金砖国家经济稳步增长的重要因素。危机不仅导致金砖国家出口贸易额迅速下降,威胁其国内金融稳定,造成不同程度的政治影响,也使金砖国家发展模式备受瞩目。为了应对危机的消极影响,金砖国家推动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并加强政府宏观管理职能,以现有多边框架为基础加强双边合作,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救助欧洲,推进国际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加强对全球治理的影响力。

关键词:金砖国家;新兴市场;欧债危机;全球治理

作者简介:杨娜,女,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讲师,博士,主要从事国际关系与欧洲问题研究。

国际关系中文核心期刊最新论文篇目信息

《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2期

- 1.朱立群、聂文娟:《从结构—施动者角度看实践施动——兼论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能动性 问题》,第4-19页。
- 2.张鸿石:《论国际政治研究中历史与逻辑的相互统一》,第20-38页。
- 3.唐睿、唐世平:《历史遗产与原苏东国家的民主转型——基于26个国家的模糊集与多值QCA 的双重检测》,第39-57页。
- 4.柳思思:《公众情感引导机制研究——塔利班与美国对阿富汗的公众情感引导比较》,第

58-76页。

- 5.李巍:《金融外交在中国的兴起》,第77-98页。
- 6.赵可金:《非传统外交:外交社会化及其后果》,第99-117页。
- 7.叶桂平:《次国家行为体的对外关系研究——以澳门特别行政区为例》,第118-133页。
- 8.熊洁:《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一项研究评估》,第134-154页。

《当代亚太》2013年第1期

- 1.王明国:《国际制度复杂性与东亚一体化进程》,第6-34页。
- 2.王金强:《制度变革与政策选择——基于国际公共资源分配问题的理论分析》,第35-52页。
- 3.刘中伟、沈家文:《美国亚太贸易战略新趋势:基于<美韩自由贸易协定>的研究视角》,第53-81页。
- 4.倪月菊:《日本的自由贸易区战略选择——中日韩 FTA 还是 TPP?》,第82-102页。
- 5.李杨、黄宁:《东盟四国加入 TPP 的动因及中国的策略选择》,第103-126页。
- 6.袁伟华:《对外政策分析中的角色理论:概念解释机制与中国—东盟关系的案例》,第127-158页。

《国际观察》2013年第2期

- 1.倪乐雄:《文明转型与中国近代海权的困境——难以抗拒的历史性落后》,第1-8页。
- 2.苏小东:《论海权对东亚国家的历史与现实影响》,第9-16页。
- 3.李亚强:《国家发展与海洋利益》,第17-24页。
- 4.南琳:《第一届中国海权战略与国家安全学术研讨会综述》,第25-31页。
- 5.叶江:《试论北极事务中地缘政治理论与治理理论的双重影响》,第32-38页。
- 6.高程:《国内集团利益与不对称冲突的转折——以北美独立战争和越南战争为案例》,第39-45页。
- 7.任一鸣:《美国和前苏联民族政策比较及对中国的启示》,第46-51页。
- 8.刘铁娃:《从倡导普世价值到倡导文化多样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动文明对话的话》,第52-58页。
- 9.王广大:《中国企业在沙特阿拉伯王国经营环境的比较研究》,第59-65页。
- 10.苏祖梅:《中国企业在中亚五国经营环境的比较研究》,第66-72页。
- 11.宋国友:《全球量化宽松、新兴经济体与国际金融治理》,第73-79页。

《外交评论》2013年第2期

- 1.刘丰:《国际体系转型与中国的角色定位》,第1-16页。
- 2.黄河、谢玮、任翔:《全球大宗商品定价机制及其对中国的影响:结构性权力的视角——以铁矿石定价机制为例》,第17-29页。
- 3.曾雄君:《美国利益集团施压人民币升值的路径分析》,第30-46页。
- 4.唐笑虹:《试析奥巴马政府的军事太空战略》,第47-61页。

5. 韩召颖、宋晓丽:《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决策探析——小集团思维理论的视角》,第62-77页。
6. 葛腾飞:《美国在伊拉克的“反叛乱”战略》,第78-94页。
7. 倪春纳:《民主能产生和平吗?——对“民主和平论”的批判及其回应》,第95-107页。
8. 李志斐:《水问题与国际关系:区域公共视角的分析》,第108-118页。
9. 张金翠:《“政事论”与印度外交战略的古典根源》,第119-130页。
10. 汪舒明:《大屠杀记忆、以色列战略文化与伊朗核危机》,第131-142页。
11. 王晋:《以色列和平主义运动探微》,第143-158页。

《现代国际关系》2013年第2期

1. 王在邦:《试论战略机遇期新阶段内涵与条件的变化》,第1-6页。
2. 马建英:《美国全球公域战略评析》,第7-12页。
3. 李新:《试析俄罗斯亚太新战略》,第13-20页。
4. 任远喆:《奥巴马政府的湄公河政策及其对中国的影响》,第21-26页。
5. 何理:《美日印三遍合作升温的背景与前景》,第27-31页。
6. 肖玉华、刘鸿武:《非洲之角安全局势评》,第32页-38页。
7. 欧债危机研究课题组:《南欧重债国发展前景》,第39-45页。
8. 杨芳:《欧债危机依赖英国对欧政策评析》,第46-51页。
9. 张怀民、郝传宇:《从地缘政治理论的历史与现状看其发展趋势》,第52-57页。
10. 谢尔盖·拉夫罗夫:《21世纪世界权力结构中的俄罗斯》,第58-60页。
11. 维塔利·沃罗比约夫、王明昌:《需要担心中国在中亚影响上升吗?》,第61-70页。

《国际问题研究》2013年第1期

1. 杨洁篪:《深入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做好新形势下的外交工作》,第5-9页。
2. 阎学通:《公平正义的价值观与合作共赢的外交原则》,第10-18页。
3. 唐国强:《北极问题与中国的政策》,第19-29页。
4. 徐以骅、邹磊:《地缘宗教与中国对外战略》,第30-43页。
5. 徐龙第、孙友晋:《主权债务危机下的欧盟外交》,第44-58页。
6. 唐小松、王凯:《欧盟网络外交实践的动力与阻力》,第59-69页。
7. 解晓东:《日本对华政策的“变”与“不变”》,第70-81页。
8. 胡令远:《日本民主党政权与中日关系》,第82-89页。
9. 姜跃春:《世界经济增速同步放缓及其前景》,第90-98页。
10. 牛新春:《伊朗的“经济圣战”:一场政权保卫战》,第99-111页。
11. 刘作奎:《新形势下中国对中东欧国家投资问题分析》,第112-124页。
12. 张晓通、詹姆斯·凯斯:《中美经贸关系:管理竞争性相互依存》,第125-134页。

《美国研究》2012年第4期

- 1.周琪、齐皓:《奥巴马连任的原因及其第二任期面临的挑战》,第9-31页。
- 2.谢韬:《从大选看美国的历史周期、政党重组和区域主义》,第32-47页。
- 3.张业亮:《美国2012年大选与中美关系》,第48-69页。
- 4.刁大明:《2012年美国国会选举与新一届国会对华政策走向》,第70-92页。
- 5.何兴强:《美国参议院“议事阻碍”:争议、改革及其影响》,第93-112页。
- 6.余功德:《第四点计划在伊朗:“示范”的背后》,第113-128页。
- 7.陶文钊:《忆唐耐心教授》,第129-134页。
- 8.章百家:《交往与印象——忆唐耐心教授》,第134-136页。
- 9.葛来仪、孙梅岑:《一个好友眼中的南希》,第136-138页。
- 10.何迪:《亦师、亦友、亦家人——怀念唐耐心》,第138-141页。
- 11.李侃如:《全身心投入工作的学者》,第142-143页。
- 12.牛军:《悼念唐耐心教授》,第143-144页。
- 13.王欢:《“2012年美国大选后的中美战略关系走向”学术研讨会综述》,第145-147页。
- 14.刘元玲:《中国美国经济学年会暨“当前美国经济走势与中美经贸关系”研讨会综述》,第147-150页。
- 15.陶飞奇:《“非政府组织与美国对外关系”研讨会综述》,第150-154页。
- 16.邵声、何芊:《“杰斐逊时代的民主、共和与国家构建”研讨会综述》,第154-157页。

《国际政治科学》2013年第1期

- 1.罗建波:《西方对非援助效果及中非经济合作》,第1-32页。
- 2.布兰德利·沃马克、温卫杰、万鹏:《非对称性与中国的朝贡体系》,第33-54页。
- 3.陈麒安:《进攻性自由主义理论初探》,第55-88页。
- 4.徐进、刘畅:《中国学者关于全球治理的研究》,第89-118页。
- 5.黄若川:《中国外交的改革的与调整》,第119-124页。

国际关系英文核心期刊最新论文篇目信息***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67, No. 2***

- 1.Jonathan Mercer, “Emotions and Strategy in the Korean War,” pp. 221-252.
- 2.Paul K. MacDonald, “Theorizing Agency in Hobbes's Wake: The Rational Actor, the Self, or the Speaking Subject?” pp. 287-316.
- 3.Ted Hopf, “Common-sense Constructivism and Hegemony in World Politics,” pp. 317-354.
- 4.Yoram Z. Haftel and Alexander Thompson, “Delayed Ratification: The Domestic Fate of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 pp. 355-387.
- 5.Lars-Erik Cederman, Kristian Skrede Gleditsch, Idean Salehyan and Julian Wucherpfennig,

“Transborder Ethnic Kin and Civil War,” pp. 389-410.

6.Martin Ardanaz, M. Victoria Murillo and Pablo M. Pinto, “Sensitivity to Issue Framing on Trade Policy Preferences: Evidence from a Survey Experiment,” pp. 411-437.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107, No. 2

1.Jan H. Pierskalla and Florian M. Hollenbach, “Technology and Collective Action: The Effect of Cell Phone Coverage on Political Violence in Africa,” pp. 207-224.

2.Eric J. Engstrom, Jesse R. Hammond and John T. Scott, “Capitol Mobility: Madisonian Representation and the Location and Relocation of Capitals in the United States,” pp. 225-240.

3.Karen and Christopher Walker, “Cold Case File: Indictable Acts and Officer Accountability in *Marbury v. Madison*,” pp. 241-258.

4.Andrew Reynolds, “Representation and Rights: The Impact of LGBT Legislator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p. 259-274.

5.Michael Bang Petersen and Lene Aarøe, “Politics in the Mind's Eye: Imagination as a Link between Social and Political Cognition,” pp. 275-293.

6.Nicholas Sambanis and Moses Shayo, “Social Identification and Ethnic Conflict,” pp. 294-325.

7.Gary King, Jennifer Pan and Margaret E. Roberts, “How Censorship in China Allows Government Criticism but Silences Collective Expression Rawls and the Forgotten Figure of the Most Advantaged: In Defense of Reasonable Envy toward the Superrich,” pp. 326-343.

8.Nahomi Ichino and Noah L. Nathan, “Crossing the Line: Local Ethnic Geography and Voting in Ghana,” pp. 344-361.

9.James H. Flower and Christopher T. Dawes, “In Defense of Genopolitics,” pp. 362-374.

10.Kristen Diane Deppe, Scott F. Stoltenberg, Kevin B. Smith and John R. Hibbing, “Candidate Genes and Voter Turnout: Further Evidence on the Role of 5-Httlpr,” pp. 375-381.

11.Evan Charney and William English, “Genopolitics and the Science of Genetics Genopolitics and the Science of Genetics,” pp. 382-395.

12.Jerrery Edward Green, “Rawls and the Forgotten Figure of the Most Advantaged: In Defense of Reasonable Envy toward the Superrich—Erratum,” pp. 396-396.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9, No. 1

1.Maja Bovcon, “Françafrique and Regime Theory,” pp. 5-26.

2.Andrew Davenport, “Marxism in IR: Condemned to a Realist Fate?” pp. 27-48.

3.Jack Holland, “Foreign Policy and Political Possibility,” pp. 49-68.

4.Chris Methmann, “The Sky is the Limit: Global Warming as Global Governmentality,” pp. 69-91.

5.Mark Neocleous, “‘O Effeminacy! Effeminacy!’ War, Masculinity and the Myth of Liberal

Peace,” pp. 93-113.

6. Colin McInnes and Simon Rushton, “HIV/AIDS and Securitization Theory,” pp. 115-138.

7. Patricia Owens, “From Bismarck to Petraeus: the Question of the Social and the Social Question in Counterinsurgency,” pp. 139-161.

8. Katharina P. Coleman, “Locating Norm Diplomacy: Venue Change in International Norm Negotiations,” pp. 163-186.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7, No. 4

1. Alastair Iain Johnston, “How New and Assertive: Is China’s New Assertiveness?” pp. 7-48.

2. Avery Goldstein, “First Things First: The Pressing Danger of Crisis Instability in U.S.-China Relations,” pp. 49-89.

3. Alexander B. Downes, Jonathan Monten, “Forced to Be Free: Why Foreign-Imposed Regime Change Rarely Leads to Democratization,” pp. 90-131.

4. Joshua W. Busby, Todd G. Smith, Kaiba L. White, Shawn M. Strange, “Climate Change and Insecurity: Mapping Vulnerability in Africa,” pp. 132-172.

5. John Hagan, Joshua Kaiser, Anna Hanson, Jon R. Lindsay, Austin G. Long, Stephen Biddle, Jeffrey A. Friedman, Jacob N. Shapiro, “Correspondence: Assessing the Synergy Thesis in Iraq,” pp. 173-198.

6. Gareth Evans, Ramesh Thakur, Robert A. Pape, “Correspondence: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and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pp. 199-214.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7, No. 1

1. Tadeusz Kugler, Kyung Kook Kang, Jacek Kugler, Marina Arbetman Rabinowitz and John Thomas, “Demographic and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Conflict,” pp. 1-12.

2. Christina J. Schneider and Johannes Urpelainen, “Distributional Conflict Between Powerful States and International Treaty Ratification,” pp. 13-27.

3. Yagil Levy, “How Military Recruitment Affects Collective Action and its Outcomes,” pp. 28-40.

4. Mehmet Ugur, “Europeanization, EU Conditionality, and Governance Quality: Empirical Evidence o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pp. 41-51.

5. Nils B. Weidmann and Idean Salehyan, “Violence and Ethnic Segregation: A Computational Model Applied to Baghdad,” pp. 52-64.

6. David Lektzian and Glen Biglaiser, “Investment, Opportunity, and Risk: Do US Sanctions Deter or Encourage Global Investment?” pp. 65-78.

7. Luke Glanville, “The Myth of ‘Traditional’ Sovereignty,” pp. 79-90.

8. Krzysztof J. Pelc, “The Cost of Wiggle-Room: Looking at the Welfare Effects of Flexibility in Tariff Rates at the WTO,” pp. 91-102.

- 9.Christina J. Schneider and Jennifer L. Tobin, “Interest Coalitions and Multilateral Aid Allocation in the European Union,” pp. 103-114.
- 10.Andrea Oelsner, “The Institutional Identity of Regional Organizations, Or Mercosur’s Identity Crisis,” pp. 115-127.
- 11.Sebastian Karcher and David A. Steinberg, “Assessing the Causes of Capital Account Liberalization: How Measurement Matters,” pp. 128-137.
- 12.Lucian M. Ashworth, “Mapping a New World: Geography and the Interwar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138-149.
- 13.Ayşe Zarakol, “Revisiting Second Image Reversed: Lessons from Turkey and Thailand,” pp. 150-162.
- 14.David H. Bearce, Steven E. Finkel, Anibal S. Pérez-Liñán, Juan Rodríguez-Zepeda and Lena Surzhko-Harned, “Has the New Aid for Trade Agenda been Export Effective? Evidence on the Impact of US AfT Allocations 1999–2008,” pp. 163-170.
- 15.Erik Gartzke and Alex Weisiger, “Permanent Friends? Dynamic Difference and the Democratic Peace,” pp. 171-185.
- 16.Michael Mousseau, “The Democratic Peace Unraveled: It’s the Economy,” pp. 186-197.
- 17.James Lee Ray, “War on Democratic Peace,” pp. 198-200.
- 18.Allan Dafoe, John R. Oneal and Bruce Russett, “The Democratic Peace: Weighing the Evidence and Cautious Inference,” pp. 201-214.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57, No. 3

- 1.Brandon J. Kinne and Nikolay Marinov, “Electoral Authoritarianism and Credible Signaling in International Crises,” pp. 359-386.
- 2.Andrea Ruggeri, Theodora-Ismene Gizelis and Han Dorussen, “Managing Mistrust: An Analysis of Cooperation with UN Peacekeeping in Africa,” pp. 387-409.
- 3.Peter Tikuisis, David Carment and Yiagadeesen Samy, “Prediction of Intrastate Conflict: Using State Structural Factors and Events Data,” pp. 410-444.
- 4.Juan E. Ugarriza and Matthew J. Craig, “The Relevance of Ideology to Contemporary Armed Conflicts: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Former Combatants in Colombia,” pp. 445-477.
- 5.Vipin Narang, “What Does It Take to Deter? Regional Power Nuclear Postures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pp. 478-508.
- 6.Omar S. Bashir and Darren J. Lim, “Misplaced Blame: Foreign Aid and the Consequences of UN Security Council Membership,” pp. 509-523.
- 7.Bruce Bueno de Mesquita and Alastair Smith, “Aid: Blame It All on ‘Easy Money’,” pp. 524-537.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20, No. 2

- 1.Cornel Ban and Mark Blyth, "The BRICs and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An Introduction," pp. 241-255.
- 2.Marion Fourcade, "The Material and Symbolic Construction of the BRICs: Reflections Inspired by the RIPE Special Issue," pp. 256-267.
- 3.Sarah Babb,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as Transnational Policy Paradigm: Its Origins, Trajectory and Likely Successor," pp. 268-297.
- 4.Cornel Ban, "Brazil's Liberal Neo-developmentalism: New Paradigm or Edited Orthodoxy?" pp. 298-331.
- 5.Peter Rutland, "Neoliberalism and the Russian Transition," pp. 332-362.
- 6.Rahul Mukherji, "Ideas, Interests, and the Tipping Point: Economic Change in India," pp. 363-389.
- 7.Matt Ferchen, "Whose China Model is it Anyway? the Contentious Search for Consensus," pp. 390-420.

Security Studies, Vol. 22, No. 2

- 1.Robert Jervis, "Do Leaders Matter and How Would We Know?" pp. 153-179.
- 2.Caitlin Talmadge, "The Puzzle of Personalist Performance: Iraqi Battlefield Effectiveness in the Iran-Iraq War," pp. 180-221.
- 3.Thomas Meyer, "Flipping the Switch: Combat, State Building, and Junior Officers in Iraq and Afghanistan," pp. 222-258.
- 4.Peter Krause, "The Political Effectiveness of Non-State Violence: A Two-Level Framework to Transform a Deceptive Debate," pp. 259-294.
- 5.Anders Themnér, "A Leap of Faith: When and How Ex-Combatants Resort to Violence," pp. 295-329.
- 6.Zachary Selden, "Balancing Against or Balancing With? The Spectrum of Alignment and the Endurance of American Hegemony," pp. 330-364.

World Politics, Vol. 65, No. 2

- 1.Dominika Koter, "King Makers: Local Leaders and Ethnic Politics in Africa," pp. 187-232.
- 2.Leonardo R. Arriola, "Capital and Opposition in Africa: Coalition Building in Multiethnic Societies," pp. 233-272.
- 3.Lauge N. Skovgaard Poulsen and Emma Aisbett, "When the Claim Hits: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 and Bounded Rational Learning," pp. 273-313.
- 4.Marco Simoni, "The Left and Organized Labor in Low-Inflation Times," pp. 314-349.
- 5.Benjamin Smith, "Separatist Conflict in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and Beyond: How Different

Was Communism?" pp. 350-381.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9, No. 2

1.Werner Bonefeld, "Adam Smith and Ordoliberalism: on the Political Form of Market Liberty," pp. 233-250.

2.Sean Molloy, "Spinoza, Carr, and the Ethics of The Twenty Years' Crisis," pp. 251-271.

3.Christopher Holmes, "Ignorance, Denial, Internalisation and Transcendence: a Post-structural Perspective on Polanyi's Double Movement," pp. 273-290.

4.Jessica Auchter, "Border Monuments: Memory, Counter-memory and Bordering Practices along the US-Mexico Border," pp. 291-311.

5.Shahar Hameiri, "the Orising Regions through Changes in Statehood: Rethinking the Theory and Method of Comparative Regionalism," pp. 313-335.

6.Peter Halden, "A Non-sovereign Modernity: Aattempts to Engineer Stability in the Balkans 1820-90," pp. 337-359.

7.Ronan O'callaghan, "Secular Theology and Noble Sacrifice: the Ethics of Michael Walzer's Just War Theory," pp. 361-383.

8.Jaremev R.Mcmullin, "Integration or Separation? The Stigmatisation of Ex-combatants After War," pp. 385-414.

9.Doerthe Rosenow, "Nomadic Life's Counter-attack: Moving beyond the Subaltern's Voice," pp. 415-433.

10.Barry J.Ryan, "Reasonable Force: the Emergence of Global Policing Power," pp. 435-457.

[整理: 石 宇、刘雨晨]

[责任编辑: 刘雨晨]

读编往来

【编者按】《新视界》从创刊始,就得到了许多师长的关心与支持,当每一期的《新视界》分发到各位老师的信箱后,他们都会认真阅读,青年学者——赵聚军老师*就是其中的一位。本期的栏目中,小编有幸邀请到了赵老师与我们一起分享阅读《新视界》的经历,并对我们的刊物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在此,小编代表编辑部对赵老师表示衷心的感谢,并把谈话内容整理出来与大家交流分享。

赵聚军老师首先对我们的办刊精神予以了肯定,他说以前见过一些院系也都曾创办自己的刊物,但中途因为各种原因都夭折了,而我们的《新视界》却一直在坚持为学生服务和奉献,这一点值得欣赏。

小编:在《新视界》的所有栏目中,您比较感兴趣的栏目有哪些?

赵老师:个人比较喜欢“学术论文”、“国关人物”两个栏目,因为“学术论文”可以给大家,尤其是学生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而“国关人物”在我看来是挺有意思的,只是近几期的“国关人物”的评价不够平实,而学术人物毕竟不是文艺明星,所以建议该栏目在遣词造句时要更平实一些。

小编:那对于整个刊物,您认为我们还有哪些做得有所欠缺呢?

赵老师:首先是刊物的定位问题,我认为应该就“学术性”或“学生性”选择一种,但是感觉刊物在这方面的定位不是很稳定。初读《新视界》时觉得它很严谨,但是后来感觉就向“黑板报”式的方向发展,所以如果要做出自己的品牌,解决这个问题是很必要的。

第二是从刊物的发展来看,我认为应该更多地把硕士生拉进来。比如说“学术论文”这个栏目就是一个很好的平台,以学术为载

体,为硕士生提供更多、更广的交流机会。在刊登学生论文的时候,建议你们更注重质量,审稿时的意见反馈可以直接刊登上去,这样来扩大硕士生的学术论文交流,让他们觉得这个栏目,这个刊物对自己的论文修改和发表有帮助,进而就会更多地关注系刊,也给刊物的创办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第三是关于扩大和其他院校交流的问题。尽管在这方面编辑部已经付出了很多努力,但是还可以再扩展一些宣传的渠道。一个是宣传的渠道较少,建议你们在外校参加各种学术交流会议时就可以进行分发宣传;另一个就是征稿的来源渠道较窄,这个也需要不断扩大,当然它与宣传是互相促进的。

第四是刊物要注意学科间交流和联系的问题,这个建议你们利用学校的正式网络平台比如“国关在线”进行宣传和交流,拓宽视野,同时也能使刊物的水平再提升一个层次。

这些就是我的个人看法,希望对你们有帮助,最后还是希望你们把这种坚持不懈的办刊精神继续传承下去,把《新视界》做得更好!

小编:赵老师的建议使我们受益匪浅,非常感谢您的支持,我们会进一步完善刊物的创办,也祝赵老师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整理:郝丽君、赵政]

[责任编辑:郝丽君]

* 赵聚军: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政府与政治,城市管理,行政区划与区域公共管理。

南开大学国际关系系论文注释体例

一、总 则

1. 正文注释采用页下注(脚注), 每页依序重新编号。
2. 注释格式: 中文字体为宋体, 英文字体为 Times New Roman, 字号小五, 单倍行距。
3. 学位论文后必须列出“参考文献”, 课程论文一般不做要求。
4. 所引资料务必真实、准确、规范。

二、中文注释

(一) 著作

1. 专著: 著者, 文献名, 卷册序号, 出版地, 出版机构, 出版时间, 页码。若出版机构名称已包含地名, 不必重复注出。

秦亚青:《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 美国在国际武装冲突中的支持行为(1945—1988)》,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 第 201 页。

2. 编著: 应在编者姓名后加“编”或“主编”、“编著”。

王逸舟主编:《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安全》,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第 60-68 页。

3. 译著: 在著者姓名前可以“[]”标明著者国别; 在文献名之后, 可标明译者。

[英]赫德利·布尔:《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张小明译),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 年版, “第六章”。

4. 如著者、编者为二人, 两者姓名之间以顿号间隔; 如为三人以上, 可省略为“×××(第一责任者姓名)等(编)”。

宇燕、盛洪:《旧邦新命》, 上海三联书店 2004 年版, 第 146、158 页。

吴志成、薛晓源主编:《欧洲研究前沿报告》,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陈志瑞等主编:《开放的国际社会: 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英国学派》,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第 49 页。

(二) 文章

1. 文集论文: 著者, 文章题目(加书名号), 文集编者名称, 文集名, 出版地、出版单位及版次, 页码。

[美]威廉·沃尔福思:《单极世界中的美国战略》, 载于约翰·伊肯伯里主编:《美国无敌——均势的未来》(韩召颖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第 99-117 页。

2. 期刊论文

张睿壮:《“人道干涉”神话与美国意识形态》,《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 年第 2 期,第 109-117 页。

3. 会议论文

任东来:《对国际体制和国际制度的理解和翻译》,“全球化与亚太区域化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天津:南开大学,2000 年 6 月 15-17 日,第 3 页。

4. 学位论文

苏长和:《全球公共问题与国际合作:一种制度的分析》,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博士论文,1999 年 4 月,第 55 页。

(三) 其他

如引用资料来自政府出版物、通讯社消息、未刊手稿、缩微胶卷等,其注释也应尽量标明编辑者、文献名、出版地、出版机构和时间、页码,或者文献性质、收藏地点、收藏编号等。如无需或不便标明著作者/编辑者,则标明其他类项也可。例如: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53 页。

《中国与八国财长就全球经济发展等问题进行对话》,新华社莫斯科 2006 年 2 月 12 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研究室:《中国外交——2006 年版》,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560 页。

三、外文注释

这一部分的说明和举例以英文文献为准。其他外文如法文、德文、日文、俄文等文献的释出,可参照相应文献释出的通约惯例。

(一) 著作

专著:著者,文献名(斜体),出版地、出版机构及版次,页码。著作者姓名以名前姓后的顺序书写。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1979, p. 18.

如为编著,则编者姓名后加“ed.”(编者为一入)或“eds.”(编者为二人以上)。

Stephen D. Krasner, ed., *International Regime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2.

John A. Vasquez and Colin Elman, eds., *Realism and the Balancing of Power: A New Debate*, Upper Saddle River, NJ: Prentice Hall, 2003, Chapter 3.

如著作者为三人以上, 第一责任者姓名之后可省略为“et al.”(意即 and others)。例如:

Judith L. Goldstein, et al., *Legalization and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2001, p. 160.

Walter Carlsnaes, et al., eds.,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Sage, 2002, pp. 354-355.

(二) 文章

1. 文集论文: 作者, 文章标题(加双引号), 文集编者, 文集名称(斜体), 出版地、出版机构及版次, 页码。

Joseph M. Grieco, “Realist International Theory and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in Michael W. Doyle and G. John Ikenberry, eds., *New Thinking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1997, p. 169.

2. 期刊论文: 作者, 文章标题(加双引号), 刊物名称(斜体), 刊物出版卷次、期号及年份, 页码。例如:

Robert Jervis, “Unipolarity: A Structural Perspective,” *World Politics*, Vol. 61, No. 1, January 2009, pp. 188-213.

3. 报纸文章: 作者、文章标题(加双引号)、报纸名称(斜体)及具体出版日期, 如能注明版面更好。

Joseph S. Nye Jr., “Lessons in Imperialism,” *Financial Times*, June 17, 2002.

4. 会议论文

David Shambaugh, “The Evolving Asian System: A New Regional Structur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East Asia Cooperation and Sino-U.S. Relations”, Beijing, China, November 3-4, 2005.

5. 学位论文

Ruizhuang Zhang,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Motives: National Interest vs. Ideology,” Ph.D. dis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997, p. 9.

(三) 其他

如引用政府或国际组织出版物、通讯社消息、未刊手稿、缩微胶卷等, 其注释也应尽量标明编辑者、文献名、出版地、出版机构和时间、页码, 或者文献性质、收藏地点、收藏编

号等。如无需或不便标明著作者/编辑者, 则标明其他类项也可。

Daniel Landau, "The Economic Impact of Military Expenditures,"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1138,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1993, p. 55.

四、重复引用和转引

(一) 重复引用

如重复引用同一文献, 不论中外文, 只需注明著作者、文献名和页码。

沃尔福思:《单极世界中的美国战略》, 第 101 页。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112-113.

(二) 转引

1. 中文文献

先将转引文献按上述注释方式释出, 以句号结束。再以“转引自”把载有转引文献的来源文献按相应方式释出。

[美]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比较政治学: 体系、过程与政策》(曹沛霖等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年版, 第 232 页。转引自胡鞍钢:《中国崛起之路》,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第 181 页。

2. 外文文献

Hans Morgenthau, *Scientific Man vs. Power Politics*,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6, p. 194. Quoted in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W. Norton, 2001, p. 19.

五、互联网资料

使用互联网资料时, 著作者、文献名称等类项同上述相应体例, 同时注明详细网址和访问时间。

《中美联合声明》, 新华网, 2009 年 11 月 17 日,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9-11/17/content_12475620.htm (最后访问时间: 2009 年 12 月 10 日)。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Global Trends 2025: A Transformed World," http://www.dni.gov/nic/PDF_2025/2025_Global_Trends_Final_Report.pdf (最后访问时间: 2009 年 12 月 14 日)。

六、参考文献

这一部分的说明和举例供制作学位论文的参考文献时参考。

(一) 中文部分

中文参考文献的书写体例同中文注释体例，文献排序规则如下：

1. 中文作者按照姓氏拼音排列；
2. 译著按照作者中译名顺序排列。
3. 同一作者的多篇文献，以专著、编著、论文为类依次排列，同一类文献按出版时间升序排列；
4. 期刊和文集的论文须注明起始页码。

示例如下：

1. 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等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2. 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述弢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版。
3. 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口：海南出版社 1998 年版。
4. 秦亚青：《权力·制度·文化：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研究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5. 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与中国学派的生成》，《中国社会科学》2005 年第 3 期，第 165-176 页。
6. 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一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5 年版。

(二) 外文部分

这一部分的说明和举例以英文文献为准。其他外文如法文、德文、日文、俄文等文献的，可参照相应文献的通约惯例。书写体例如下：

1. 第一著作者姓名以姓前名后的顺序书写，姓名以逗号间隔；
2. 以第一著作者英文姓氏顺序排列，首行缩进 2 字符；
3. 同一作者的多篇文献，以专著、编著、论文为类依次排列，同一类文献按出版时间升序排列；
4. 同一作者姓名多次出现以“——”代替；
5. 期刊和文集的论文须注明起始页码。

示例如下：

- Doyle, Michael W. 1983. "Kant, Liberal Legacies, and Foreign Affairs, Part II."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12(4): 323-353.

———. 1986. “Liberalism and World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0 (4): 1151-1169.

Elman, Colin, and Miriam Fendius Elman, eds. 2001. *Bridges and Boundaries: Historians, Political Scientists, and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Keohane, Robert O. ed. 1986.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Waltz, Kenneth N. 1967. *Foreign Policy and Democratic Politics: The American and British Experience*. Boston: Little Brown.

———. 1979.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 2000. “Structural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5(1): 4-41.

———. 2002. “Intimations of Multipolarity.” in Birthe Hansen and Bertel Heurlin eds. *The New World Order: Contrasting Theories*. London: Macmillan. pp. 1-18.

征稿启事

《新视界》(季刊)是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主管,国际关系系学生自筹自办、倡导学术性和生活性相结合的学生刊物。本刊秉承“知识性、交流性、原创性”原则,以“我的视界我做主”为理念,旨在为师生搭建交流的平台、营造学术的争鸣氛围,为国际关系的发展提供助力。“立足于南开,但又限于南开”,我们热忱欢迎校内外和国内外学人和同学惠赐佳作。

本刊主要有学人访谈、学术论文、书山有路、国关人物、他山之石、新书架、英采飞扬等固定栏目。另外,根据学科发展及国际形势变化,本刊还适时增设论文工作坊、学界动态、聚焦、笔谈等浮动栏目。本刊欢迎学术性论文(包括书评),国内外国际关系学者访谈、学术历程介绍及轶事,新书评介及学术动态等方面的稿件。来稿正文字数在 10000 字以内为宜。

投稿须知:

1. 本刊来稿一律要求原创首发,文责自负,反对剽窃、抄袭等一切学术不端行为(由于本刊**内部发行,不影响作者转投**其他公开性学术刊物)。本刊将竭诚为作者进一步研究提供交流平台。
2. 来稿需为 Word 文档格式,注释采用脚注,格式参阅本刊附录《国际关系系论文注释体例》。投稿请作者把稿件电子版以附件形式发至本刊邮箱 newvision@mail.nankai.edu.cn,并请提供 200 字以内作者基本信息(姓名,性别,教育背景,单位,职称,邮箱,电话,通信地址等)。
3. 首次涉及的外国人民、地名、机构名及其他专有名词,中译名请参照商务印书馆 2007 年版的《英语姓名译名手册》,并在中译名后括号内注明原文。
4. 所有学术性来稿采取双向匿名审稿制度,将在一个月内审读来稿并告知作者是否采用。对拟采用的稿件,编辑部将请作者根据评审意见进行修改,并在出刊后向作者寄送该刊物两本。另外,本刊根据栏目需要有权对来稿酌情删改,如不同意请在来稿中注明。
5. 编辑部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中国天津市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300071)

邮箱: newvision@mail.nankai.edu.cn

博客: <http://blog.sina.com.cn/nkirnewvision>

主页: <http://nknewvision.yolasite.com/>

NEW VISION



南开大学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国际关系系 主管
《新视界》编辑部 主办